

小满

讀享·九州

讀享九州
JIUZHOU PRESS



精彩看点

卷首语：小得盈满，
憧憬新生

为什么读
历史？

杨天石：历史决断
中的蒋介石

新旧嬗变的
时代

没齿无怨言

李海文：那一代人的奋斗与辛酸

徐复观：不甘心只做一个儒家

下跪和中国人的尊严

王阳明：何为知行合一

中国历史十大政变

一位情若莲花的女子

陈寅恪晚年诗中的冯
友兰

中国历史上的“四方”
较量

目录

- 3 / 卷首语：小得盈满，憧憬新生
- 6 / 读享团：杨天石-历史决断中的蒋介石
- 10/ 李海文：那一代人的奋斗与辛酸
- 16/ 徐复观：不甘心只做一个儒家
- 26/ 没齿无怨言
- 29/ 新旧嬗变的时代
- 33/ 为什么读历史？
- 37/ 王阳明：何为知行合一
- 41/ 陈寅恪晚年诗中的冯友兰
- 48/ 中国历史上的“四方”较量
- 54/ 下跪和中国人的尊严
- 61/ 中国历史十大政变
- 69/ 一位情若莲花的女子

卷首语：小得盈满，憧憬新生



四月初四，小满。

“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是入夏的第二个节气日。入夏而未到盛夏，处处却已经是自由繁衍和生长着的生命，早已灌满了夏日的热情。

在欧阳修的诗词中，小满是“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那些渐渐褪去鲜绿，染上太阳光辉的麦子，铺散在落满汗珠的土地，即使是睡在梦里，也会被生长的气息悄然惊醒。从庄稼的小满里憧憬着夏收的殷实，一切希望也正在酝酿。

憧憬，该是一个动词。TA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词汇，生生不息。钱穆先生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天道是活生生的整体，全世界也是活生生的整体，每一个生命体的生实际关系到任何一个生命的生，万物一体，息息相关。

中国的地域寥廓，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而分成了东南西北四方，进而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四方”较量，更像是“四方”地域文化在大中国之内的相互碰撞与融合。

地方博弈，怎能少了决定历史走向的人和事呢？如今察读在中国的封建历史发生过的十大政变，难免令人唏嘘之外，更升腾出一份历史责任感。

每个时代，都有着那么一群人，有意无意间做着左右他们那个时代的事情。或谋权篡位，改朝换代；或追求和平与民主……“历史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

谦受益，满招损。每一种极端，都是对另一个极端的苛求和诱发。小得盈满，好在知足小满。满中自有所获，盈中孕育着新希望。

《读·享|九州》从最初的谷雨创刊到今天的小满，也已到第三期了，从无到有，到如今的勃发生长，我们一直在憧憬着、努力着。希望您阅有所得，读有所思。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5年5月21日



读书会现场（左：纪彭 中：杨天石 右：黄道炫）

历史决断中的蒋介石

◎ 杨天石

2014年8月30日,搜狐文化中心举办题为《三项历史决断中的蒋介石——“打老虎”、治疆和钓鱼岛争议》的高端读书沙龙,杨天石、黄道炫做客搜狐,与嘉宾主持纪彭一起畅谈蒋介石的重要历史决断和经验教训。

“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探蒋介石反腐动机

纪彭：欢迎大家来到阅读中国搜狐读书会，我是主持人纪彭，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大家很熟悉，一位是研究蒋介石问题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黄道炫老师，今天我们想探讨一下蒋介石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决断，其中会谈到世界大势，也会讲到个性，我们希望借助这个话题和两位老师扎实的功底与积淀，为大家展现出一个更为生动的蒋介石，以及通过这个人物能够看到的大历史的背景。

有人评价蒋介石叫做“民主无量”，也就是说蒋介石的气量不是那么大，而且国民党执政中还存在着一个顽疾——派系很多，所以说到内政问题，他的问题就是来自于四大家族，一触碰到这些的时候，蒋介石就心慈手软也好、照顾自己人也好，总之表面上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基于这两个观点，一个是蒋介石在抗战当中，由于财务问题责令枪毙掉大老虎，处理了孔祥熙的一个亲信，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抗战中，政府只剩下西南一隅了，杨老可以给我们梳理一下，蒋介石当时会对自己人痛下杀手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一定要把孔祥熙的亲信枪毙掉？

蒋介石本人不贪污 难抵国民党腐败严重

杨天石：很长时期，我们在总结国民政府垮台失败的原因的时候，都会谈到一点——国民党贪污腐败。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这个党、这个政权太腐败，这是事实。但是我在研究过程里发现一个问题，蒋介石本人不贪污，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蒋介石本人贪污的证据，而且蒋介石本人是比较坚决地反对贪污的。

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林世良案”，林世良是孔祥熙的亲信，而且孔祥熙一家从孔祥熙开始，包括宋美龄，包括孔二小姐都很喜欢这个林世良，所以抗战时期林世良负责管理西南的运输，管运输可是一个肥缺，因为要管汽车。当时世界各国援助国民政府抗战的物资首先要运到仰光，然后通过仰光、通过滇缅公路转运到重庆，所以说仰光和滇缅公路是当时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日本人千方百计要控制仰光和滇缅公路，斩断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和世界交通的要道。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国方面要赶紧把仰光的物资、外国的援助，还有中国商人在仰光储备的物资运到内地来，运输资源必然非常紧张。当时仰光有一个华商，手上掌握了一大批汽车零件，想要抢在日本人进攻仰光之前运回重庆，但是没汽车，汽车首先要保障运送公家的

东西,不可能优先给一个私人商人运送货物的。所以这个华商就花了一百五十万贿赂运输的负责人,也就是刚才讲到的林世良,林世良拿到一百五十万以后,就以公家的名义帮助这个华商把东西从仰光运到了重庆。一个商人用一百五十万作为贿赂,把自己的货物运回来了,所以说,林世良的第一个罪状是受贿;第二个罪状是私货冒充公货走私。



杨天石在读书会现场

孔祥熙请客救亲信 蒋介石改判死刑

这个商人当然被逮捕了,林世良也被抓了。应该说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这种贪污走私的问题是非常严厉的,不是作为一个一般的贿赂问题,而是用军法来处理。由当时的军法执行总监部,就是军事法院来审判,我之前讲到林世良是孔祥熙的亲信,孔祥熙全家都非常喜欢他,所以孔祥熙一定要救这个林世良,救

的办法就是请客吃饭。孔祥熙就找了一天,把这个军事法院的院长何成俊和其他有关的法律人士都找来,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林世良这个案件按照法律不够死罪,既然贪污一百五十万不够死罪,那么谁也不能把他当成重案来办。孔祥熙的意思是想通过这个宴会给林世良讲情,减轻对林的惩罚,而且在宴会上孔祥熙特别讲,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委员长打过招呼,委员长表示“好的好的”,同意从轻处理。

但何成俊见了蒋介石本人,蒋很关心这个事情,蒋给何成俊的指示是“一定要按法律来处理,要秉公来处理,不要考虑其他因素”。这个其他因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考虑林世良是孔祥熙的亲信,一定要秉公按法律处理,所以后来军法总监部判林世良无期徒刑。这个事情报到了侍从室,蒋介石说判轻了,因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于发现的贪污案件基本上的处理都是枪毙,有一个官员只贪污了九百块钱当时也是枪毙的。蒋介石马上表示说是判轻了,要改判枪毙。

另外还有一个同案犯姓许,这个人更是孔祥熙的亲信,军法总监部判了有期徒刑五年缓期执行,蒋介石说这个人要立即执行,不能缓刑。蒋介石这么讲后,第二天林世良就被枪毙了。蒋介石改判后很高兴,在日记里写道:别人说孔祥熙包庇他的亲信徇私,我现在把林世良枪毙了,相信一定会对整顿官场的吏治发生很

好的影响。所以说这件事情是抗战期间很有名的一个案件,蒋介石使用很严厉的办法惩办了孔祥熙的亲信。

蒋介石称走私严重、吃空饷致抗日战争失利

杨天石: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我想不是,我在军事法院院长何成俊留下的日记里,发现了很多起类似的案件,蒋介石大部分都是用枪毙的办法来对待贪污犯的,采取的惩罚,第一是军法,第二是枪毙。应该说蒋介石从主观上来说,还是反对贪污的。

我今天来参加搜狐读书会之前,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材料,是关于蒋介石怎么对待军队里的贪污的。国民党的贪污泛滥成灾,不仅政府官吏贪污、国民党官僚贪污,军队军官的贪污也很严重。我看到一个什么材料呢?就是1941年12月9号,蒋介石发给全国各个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电报,12月9号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的一天。蒋介石在电报里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抗战已经不是孤立的战斗,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中国的军队、中国的战场非常重要。”然后他就非常严厉地批评中国的军队走私太严重的问题,有几个重要的战役,例如中条山战役、郑州战役、浙东战役都打败了,为什么会打败呢?原因就是军队走私让

日本人有机可乘,冒充走私者混进来部队,此外,明明没有那么多兵,虚报名额,吃空饷的情况也很严重。

从蒋介石这个电报看来,他对军队的腐败是很清楚的,也是想解决的,并不是视而不见,或有意地把这些贪污的现象掩盖起来,不是的。当然,最后国民党的贪腐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原因很复杂,需要再深入地讨论。

相关图书: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

作者:杨天石

九州出版社出版

“读·享·团”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李海文：那一代人的奋斗与辛酸

◎ 李海文文,陈辉整理

1930年代,师哲在苏联情报部门工作,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间关系很复杂。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

斯大林为何给国民党钱



1930年代,师哲在苏联情报部门工作,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间关系很复杂。

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苏联人靠的是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再派工人组成工作队下去,征粮、消灭富农,搞农业集体化,是从城市到全国。而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三国际给中国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错误的指示,比如苏联人要反右,他让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反右。他要搞肃反,让全世界共产党都搞肃反。对中国革命也出过一些不太好的主意。

王明对苏联人吹,说中国共产党有多少红军,有多少党员,所以1935年7月开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主席台对面墙上就挂着中国地图,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9月上旬,陈云、潘汉年和杨之华等七八个人到莫斯科,汇报说根据地都丢了,中央红军损失很大。斯大林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苏联是唯一给国民党援助的国家,前后三次共2.5亿美元。让国民党能牵制日本不进攻苏联。

斯大林对中国有误会



皖南事变后苏联人特别生气,觉得蒋介石对共产党下手太狠,就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

那时八路军、新四军很困难,军饷是国民党发,部队扩大了还按原编制发。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军饷、弹药、被服,并封锁我们。日

本人将主要力量(伪军的95%,在华日军的50%左右)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缩小一半。

进延安之前,延安不到1万人,后发展成5万人了,4万人都是我们的干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所以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时,毛主席对斯大林说我们不可能战术上配合。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又要求我们到边境拿武器,战术上配合,毛主席又一次拒绝了。毛主席是独立自主,王明提出过“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脱离中国实际。

我认为,斯大林对毛主席有误会,说我们那么困难你都不帮我们。其实斯大林不了解情况,我们更困难,日本人在长城附近制造无人区,别说大部队,就是小部队通过无人区都是很困难的。但这个看法,师哲没跟我讲过,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运动为何会扩大化

师哲告诉我,苏联第一次肃反起因是基洛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暗杀,斯大林很愤

怒,要查怎么被暗杀的?查的过程中扩大化了。斯大林知道了,说怎么能扩大化呢?再查,谁扩大化的?第二次又扩大化了。然后斯大林还想查,想搞清楚。又搞了第三次,又扩大化了。这时斯大林明白了,不能再搞了。师哲说肃反就是这么扩大化的。

大国搞运动,一点不扩大化确实太难了。



师哲回国后,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毛主席要借相对安静时期清理党的政策,统一思想,在高级干部中展开讨论,我觉得毛主席说的许多话,现在也适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应该好好学习。

在1942年整风时,发现确实有特务。但估计过高,扩大化了。我们保卫部门派出去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里的人,结果被咱们另一个系统报回来了,再加上苏联也搞肃反,康生在

苏联学会了肃反的“经验”，他领导“抢救失足者”就扩大化了。

后来毛主席给大家道歉。毛主席说我给你们敬礼，你们不原谅我就不把手放下来。

性格激烈倔强的师哲

师哲对斯大林的评价，一会儿特别高，一会儿特别低。他女儿给他写了一本书叫《峰与谷》，有人说，看了这两本书（另一本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是两个不同的人。

师哲个性特激烈，有陕西人的倔犟。他儿子都跟我说，你看我爸有朋友吗？师哲骄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我在序言中说：“我从事专业党研究近30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

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师哲主动离开中央，至于为什么，就不知道了，起码他不

愿意看到中苏关系不好，他不愿意参与这些事了，我觉得他对苏联还是很有感情的。师哲有一个儿子是他妻子带来的，叫李钊。父亲是烈士，这个孩子一度改姓师。后来他要到捷克留学，师哲跟他说：你还改回姓李，因为你是烈士的子弟，你的爸爸是烈士。

师哲对政治非常敏感，想得很远，怕自己万一出事李钊受牵连。

师哲眼中的首长们

师哲对当时的中央领导评价很高，比如任弼时，在五大书记里，他最年轻，比毛主席小11岁，当年跟陈独秀吵过架，那时任弼时才23岁，陈独秀都48了，那时连毛主席也没跟陈独秀去吵架。

任弼时非常聪明。他到街上看到人家在那儿画画，他买了一个笔，自然就会画，无师自通。

师哲对彭德怀有点看法，他说（延安整风时）他去彭德怀那儿，彭德怀赶快躺下装睡着，因为师哲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但他对彭德怀印象很好。

师哲与高岗关系也很不错，他们都是西北

人,一次高岗离开延安,陪江青出巡到绥德调查,师哲批评高岗:你把延安丢了,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赶快讲了实话,说这是为了照顾主席才去的。他说:我不捧她但是也不能得罪她。一般人能说这种话吗?所以他们之间很熟。建国后,他和高岗一起去苏联访问,当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说:你给我拿着皮包。师哲说:我记性不好,爱丢东西。拒绝了。他们之间很随便。

师哲 1959 年回北京,想见毛主席,让毛主席给他安排的更好一点,后来庐山出事了,也是西北人的安子文说你赶快走吧,再不走比这个处理还坏,趁着毛主席还没回来。

心中有信念的一代人



康生和师哲都是留苏回来的人,都有“亲苏”背景,但中苏关系恶化后,两人命运很不一

样。当然,康生原来地位就比师哲高,1931 年就是中央委员,没有可比性,此外,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加上师哲自己在生活作风上也犯了错误。

我觉得郝在今《中国秘密战》里对康生的描写挺准的,他说康生带有共产国际的东西,康生在延安穿的靴子也是西式的,穿从苏联回来的那种皮衣。说话时不时说两句俄语。

我 1975 年见师哲时,他已经 70 岁了,非常健谈,我们俩谈了一上午。我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那儿跟我说,“年轻人,要警惕啊!”因为 1975 年局势动荡,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当然,他们这些人都是有信仰的,在参加革命时就想好了,会坐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委屈。他们说: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个不是说说,而是说从心底里真正的相信。而且他们没有做坏事,问心无愧,不害怕审查。

那些共产党先辈,他们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看着这个国家太受人欺负了,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积贫、积弱,要改变这种面貌。要不然建国时,毛主席怎么会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批人心里是有国家的,所以他们不太在乎个人的得失。因为他们参加革命不是奔着官去的,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寻找个人的出路,而是为救国,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民族强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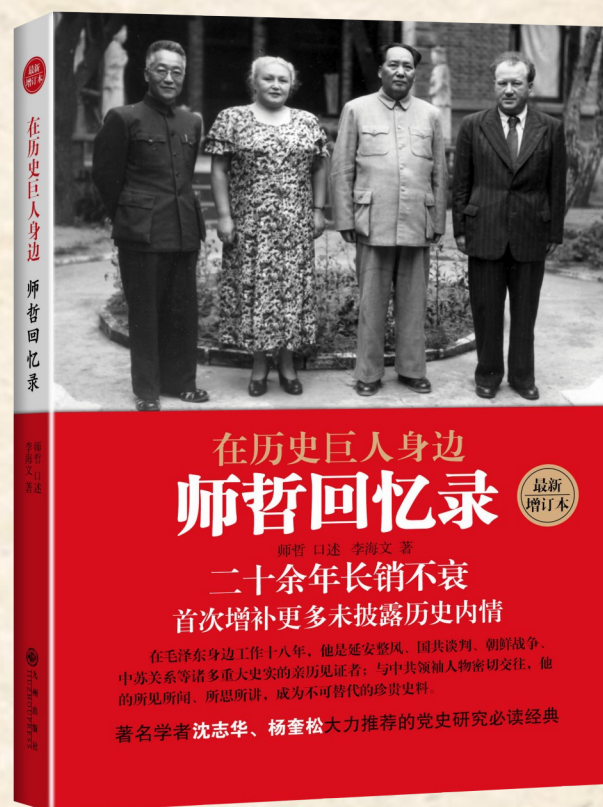
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有一次访问郑超麟,他是托派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坐牢的。托派1950年闹事,要夺取政权,是有行动的,所以把他们抓起来了。“文革”后才放的,他一共坐了37年牢。我问他:郑老,您坐这么多年牢,你怎么过来的?我说,看过一个简报,你从牢里出来了,你说你信念不变。我说有没有这么回事?他就笑了,不说有也不说没有。我问他:你坐了这么多年牢,你怎么能够活这么大岁数?他说我在入党之前早就想好了,我要参加革命是抛头颅洒热血,我连命都不在乎。

我都没有问过师哲这种问题,我觉得都用不着问。我们已经很了解了。因为我跟郑超麟就见了一面,所以就问了这样的问题。

这批人都是这样的。那时候参加革命,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随时要牺牲的。包括1942年以前那么艰苦,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一句话,布尔什维克是用特

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待人简单粗暴、知识不够等。但是他们对革命很忠诚,而且就是愿意牺牲自己,他们没有考虑到别的。



陈辉/整理

李海文,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相关图书:《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作者:师哲口述、李海文著

定价:69 元

出版:九州出版社



徐复观：不甘心只做一个儒家

◎ 何卓恩

20世纪湖北黄冈一带学问家、思想家辈出，享有盛名的如黄侃、熊十力、汤用彤、李四光、王葆心、王亚南、闻一多、徐复观、胡秋原、陶希圣、殷海光、夏道平等皆是。这是张之洞督鄂期间推动自强，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开新而又存古，长远影响所致。徐复观（始名秉常，字佛观）是湖北浠水人，1903年生，1982年卒，以“新儒家”名世，著述等身，此次九州出版社结为全集，总计达25种、26册之多。

“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

“政治与人生” “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全集》读后

20世纪湖北黄冈一带学问家、思想家辈出,享有盛名的如黄侃、熊十力、汤用彤、李四光、王葆心、王亚南、闻一多、徐复观、胡秋原、陶希圣、殷海光、夏道平等皆是。这是张之洞督鄂期间推动自强,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开新而又存古,长远影响所致。徐复观(始名秉常,字佛观)是湖北浠水人,1903年生,1982年卒,以“新儒家”名世,著述等身,此次九州出版社结为全集,总计达25种、26册之多。

徐复观的前半生尚非“学人”,而只是一个保有文心的“武人”,官拜陆军少将、总统秘书处侍从室第六组副组长。他的华丽转身,肇端于抗战后期与现代儒学大师熊十力的结识。抗战期间熊十力相继刊行《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徐复观读后为之吸引,写信求教,被约见于勉仁书院。在见面中熊先生就读书之道给过他“起死回生的一骂”,把这位陆军少将骂得目瞪口呆,

觉悟到“小聪明耽误一生”的危险,开始“走进学问之门”。而同时,熊先生“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教诲,和不遗余力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启发着徐复观对于“道”与“势”的认识,为他从政治转向学术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政府还都南京,开始对付抗战中迅速崛起的中共武装,国共之间的矛盾呈现日趋上升的趋势。徐复观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断然决定退役,用心于学。他争取到蒋介石的资助,1947年5月在南京创办《学原》杂志,邀约国内知名学者在上面发表研究论文。虽然此时他尚未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见解,但这个举措显然是走向学人生涯的第一步。1949年《学原》杂志停刊,又求助于蒋介石,在香港创办了学、政兼论的《民主评论》半月刊。徐复观“自此正式拿起笔来写文章,由政论而学术,开辟了进入大学教书,并专心从事研究、著作的三十年的新的人生途径”(《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p167之《末光碎影》)。

三十年中,徐复观所著书,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学术研究,“全集”中的《两汉思想史》(全三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

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文学论集》、《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译著)、《诗的原理》(译著)、《石涛之一研究》等属此;一为思想表达,“全集”中由报刊文章结集而成的《学术与政治之间》、《论文化》、《论文学》、《论艺术》、《青年与教育》、《偶思与随笔》、《论知识分子》、《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等比较集中。

徐复观以“新儒家”名世,“为往圣继绝学”为其神圣使命,但在他人生的早年,却也跟其他“五四新人”一样,曾有过打倒孔家店、弃置线装书的曲折。徐复观“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据他自己说是在办《学原》之际,那个时候抗战胜利的欢腾已经烟消云散,国家处在内战危机之中,知识界纷纷左倾而对时局推波助澜。《学原》之创办,团聚了“一些不为左翼所惑的学界人士”,使徐复观除了熊十力先生的启示,又能得之于友朋的切磋和砥砺。那段时间,牟宗三等先生与徐复观经常见面,常常谈些文化思想的问题,“徐先生很能契入,很能理解”。他们在切磋和砥砺中形成的共识是,阻止民族沦为“极权”社会,惟有回到两个正统:一个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一个是西方文化的正统,并且要用中国文化正统去接通西方文化正统。而

中国文化的正统,就是孔孟思想。

徐复观的后半生,绝大部分的精力,就用在阐发“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上。他对中国近代尤其“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发现中国文化在五四时期吃下决定性的败仗,实际上只意味着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了压倒的胜利,而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失败。那时维护中国文化的学人溃不成军,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维护缺少学术上的根基,不堪一击。但同样因为缺少学术根基,执舆论牛耳的西化派也始终不曾建立起真正的西方文化。两派绝无根基的结果,以超越中西的形态出现的社会主义便乘虚而入,吸引具有原始朝气、原始正义感的知识青年,发展成为强大势力而左右国命。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虽有梁任公、张君勱、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东荪等少数有个性的思想人物屹然不为所动,默默做着自己的学问,但他们的孤军奋斗影响仅及于学院的范围,不能扩张到社会,而战端一开,则难免在颠沛流离中被淹没。徐复观认为大陆的“沦陷”,对九死一生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来说,到了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时候”。

流亡港台的知识分子确实开始反省,代表政治反省的是西化派人士为主的《自由中国》,将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曾经灰色暧昧的自由民主旗帜重新祭起,并以比较纯正的个人主义做理论基础,对文化则并无反省,沿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代表文化反省的,则正是徐复观主办的《民主评论》。“《民主评论》的态度,也是坚持民主自由;但他们宁愿自称为人文(人性)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不愿以自由主义者为满足。”(《学术与政治之间》,p413之《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所以在文化上“他们所期待的是要超过五四的时代,而不是要拉着五四时代回头走”(同上,p413)。

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发表过几篇大文章,其中《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等都是集中阐发儒家传统内在精神命脉的。后来他殚精竭虑研究先秦人性论、两汉思想、经学史,都是为了显豁中国传统精神的真价值。他说,“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两汉

思想史》卷三代序)。

他认为只有充分尊重历史文化,才有接纳外来文化的可能。“我们谈中西文化,一方面是认定我们有文化,同时也是反省我们文化的甘苦,使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在世界文化的共性中,在世界文化的其他个性中,挺身站起来,作正常底接触,作正常底吸收。”(《学术与政治之间》,p78之《文化的中与西》)传统文化被打倒,就会成为一个野蛮民族,野蛮民族不可能实现对外来文化的有效吸收。他指出,五四时代的反传统犯了多重错误:一是把不合理的政治与文化中的传统混在一起;二是以为传统与科学是不相容的;三是不了解传统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四是根本不了解传统有层次之分。要发展五四的文化观,就要“走我们以高次元传统的自觉,融和中西,以形成新传统之路”(《论文化》(二),p479之《论传统》)。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

以卫护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徐复观,却有着历史理性的冷峻。与其他现代新儒家相比,他表现出更多的批判性,而批判的基点,则

是与他反省中所坚定的政治价值——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曰民主政治——有关。他自称:“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到了二十九年以后,我虽然放弃了马、恩的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并无信心。到了三十八年,我才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为我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p191之《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

徐复观写过很多文章来表达他对民主政治信念的坚守,比如《我们信赖民主主义》、《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悲愤的抗议》等。这些文章声言,尽管民主政治也有其不足,但基于其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障少数的原则,这种取决于量而不取决于质的制度不会影响到人类质的向上,反而最能够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实,体现忠恕之道,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中国文化,充满了忠恕精神,却不曾发现实现此一精神的生活方式,所以此一精神始终只停留在道德上面,而不能在政治社会上发生大的效用。西方文化的基础,并不根发于忠恕精神,但他在历史的政治对立斗争中,迫出了这一方式,便也可称为‘强恕而行,为仁莫近’了。”(《学术与政治

之间》,p29之《我们信赖民主主义》)至于民主制度的自身的流弊,他觉得只能通过民主制度本身自我完善,企图以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去取代,“这恰似缚住自己的手脚,麻醉自己的心灵,以求渡过各种灾厄一样,只有把人类更推向不可测度的深渊里去”(同上,p434之《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因此,他向围剿自由主义,企图以国家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公开表示抗议。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是徐复观接通传统文化的重要归趋。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精神,如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信赖,中国文化中早已具备,甚至中国古代已经有了牟宗三所说的“治权的民主”;但民主政治的制度,或者说“政权的民主”,则一直没有确立,“尽管以民为本,而终不能跳出一步,达到以民为主”(同上,p53之《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这正显示中国文化在政治上有尚未成熟的一面。“儒家的政治思想在历史上只有减轻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为人类的和平幸福描画出一个真切的远景,但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乱的历史上的循环悲剧。”(同上,p52之《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

其转进》)所以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接通西方历史迫出的,人类普遍适用的民主制度,“只有老老实实地走民主的路,才能立国家之大本,才能开太平统一之基”(同上,p42之《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

针对一些传统派同道认为中国传统式的民主更优于西方民主,更适合于中国人的性格,提出不必仿效西方,徐复观明确表示反对。他也注意到民国以来的大小野心家常背着中国文化的招牌,走向反民主方向的事实,特别用心厘清维护传统、抵御西化与追求民主制度实现之间的合理关系,断然指出民主政治是可以容纳各种“政治内容”的“政治形式”,是政治的常数、常道,“我们今日在创巨深痛之后,感到只有先建立政治的常数、常道,然后才能够杜塞乱源,为国家开万世太平之局”(同上,p31之《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他坚决相信,中国所要实现的民主政治,不是转回头去走治权民主而政权不民主的老路。儒家思想中的人道精神能够充实民主政治,使之发挥最大程度的价值,但民主就是民主,“我不相信中国有什么特殊的民主”。

“政治与人生”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命脉需要传承,而政治制度则需要转进,这就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分合关系。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修己治人一体,内圣外王不二,兼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功能。而现代学术的划分法,文化在社会人生层面,政治在国家权力层面,两者分属不同领域。那么在现代中国,既要继承文化传统,又要转进政治制度,二者关系如何安置?徐复观专门写了《人生与政治》、《政治与学术之间》、《释〈论语〉“民无信不立”》、《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等文章,试图帮助人们去了解这种关系。

概言之,徐复观是将政治涵盖在人生之内,作为人生的一个无法逃避的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政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应以一部分掩盖了整个人生,而且政治在人生中是紧连着权力欲、支配欲的,这是人生中最坏的一部分,是与禽兽一鼻孔出气的一部分。我们之不能不要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出于人生之不得已。”(同上,p82之《政治与人生》)我们要使人生的政治部分做人生其他部分的工具,为人生其他的部分开路,万不可把人生其他部

分作为政治部分的工具。

西人有言,政治为必要之恶。然而,现实中的政治之恶,却常常越出“必要”的范围。在中国政治理想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曾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但从未真正实现。徐复观认为,现实中只能追求相对合理的政治,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过问政治,也可以不过问政治。要过问政治时,没有人来说不准你过问;想不过问政治时,也没有人来说你非过问不可。要过问政治,则从心到口直道而行,没有人来监视你的言论或投票;不要过问政治,则从工厂到教堂自由选择,没有人来加以干涉统制”(同上,p82之《政治与人生》)。政治可以根据人生的需要随时提起,随时放下。这种政治便是近代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政治才是作为人生工具的政治,人在这种政治中才可以发展整个的人生,建立真正的人文世界。”(同上,p82之《政治与人生》)

以徐复观的看法,民主政治既有主张权力的一面,也有否定权力的一面,所以它不至于使人完全兽化,反而能够敞开人生的大门,铺平人生的大路。“在已经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可以任意地不谈政治而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在未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为了

要使每个人都能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便必须首先共同争取这种敞开人生之门的政治。”(同上,p83之《政治与人生》)

这显然是将人生与政治看做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且比较强调政治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分”。事实上徐复观在分析儒家修己治人的标准时,也看到深层次中这种“分”的存在。他发现“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学术上所立的标准,和在治人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政治上所立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地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价值。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但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同上,p277-278之《释〈论语〉民无信不立》)。一般人生领域重于教,政治上则重于养,富之而后教之。这种价值差别,在现代民主社会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更为显著。“学术对社会国家直接负责,是通过教而不是通过政,教是在自由中进行,而政治则总带有强制性。”(同上,p139之《学术与政治之间》)而具体到教化和政治的内容,则是“从教化上立人格的

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同上,p259之《为生民立命》),以普遍人权的实现做国民人格整体提升的基础,以每个人的德性修养充实基本人权,使其有真实的内涵。

“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徐复观与其他新儒家一样,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更多地赋予了知识分子。

这里被寄予希望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技术人员意义上的知识人。“以其知识影响社会的是知识分子,以其技术建造机械、使用机械的是技术人员”;“技术的效用是无颜色的,所以技术人员可以为各种形态的极权专制者所容,甚至为他们所需要。而知识接触到实际问题时,经常是以批判之力,发挥推进的作用,所以知识分子必然被各种形态的极权专制者所排斥”(《论知识分子》,p264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所以凡不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带着悲剧性的命运。但也正因此,他们的责任“乃在求得各种正确知识,冒悲剧性的危险,不逃避,不诡随,把自己所认为正确而为现实所

需要的知识,影响到社会上去,在与社会的干涉中来考验自己,考验自己所求的知识性能,以进一步发展、建立为我们国家、人类所需要的知识”(同上,p264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过,徐复观仍不以此界定为满足。他提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尽到以知识影响社会的责任,首先要尽到使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责任,也就是要具备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他给这种道德人格确定的标准,归结起来,消极方面为:不投机取巧,不趋炎附势,不歪曲知识,不出卖良心;积极方面为:敬重知识,敢于以道抗势,体认民族,甘于为国效命。仲长统在《昌言》中曾提出“士有三贱”之说,“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徐复观深有同感。他认为这些卑贱人格不仅不足以承担历史责任,反而“坏的作用绝对大于好的作用”。

徐复观自己以“堂堂正正读书人”自期,着力于振衰起敝、挽救国族的危机,在学术上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在社会政治领域也表现出勇毅的担当,被誉为“勇者型新儒家”。内战后国民党偏安台湾,社会空间受到专制权力的肆意挤压,公开对此做出抗议和批判的是雷震、殷海光

等自由主义者主导的《自由中国》，儒者徐复观也在《自由中国》发表过《“计划教育”质疑》、《青年反共救国团健全发展的商榷》、《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等言辞锋利的文章，反对政治力对自由教育的伤害，批评蒋介石超越于宪法的强势性格，被当权者视为跟国民党“过不去”的“好出风头的所谓政论家”，而受到敌视和怀恨。

《全集》读后

复观先生的思想和学问博大精深，上述介绍挂一漏万，只想起一点推介的作用。

正如复观先生所言，一个民族对自己有信心时，一般人便从好的方面去看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民族失掉信心时，一般人便从坏的方面去看自己的历史。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虽尚未统一，却均已告别“失掉信心”的时期，尊重文化传统之风勃兴，社会氛围已非复观先生当年之逆境可比。九州出版社适时推出《徐复观全集》，一则有望为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添火增温，一则可以让读者体会文化建设的曲折艰辛，实为嘉惠学林之举。

拜读复观先生巨制宏文，有三点感想贡献

给读者诸君：

一、学问有多种做法。人在江湖、言不由衷的“学问”，是假学问；安居象牙塔、不问世态炎凉的学问，是纯学问；察古今之变、究兴亡之术的学问，是真学问。复观先生做的真学问。

二、仁爱礼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科学民主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两者分居于东西文化的中心线上，自当兼容并蓄、继往开来。一个身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能正面吸收仁爱礼义等传统价值，那就不会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一个立足当代世界的儒家，如果不能正面推进自由民主等现代精神，那也很难说称得上一个有活力的儒家。复观先生说他不甘于只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他的思想角色，也正好是不甘心于只做一个儒家。

三、伦教治心，宪政治世，分则两得，混则两失。复观先生关于政教关系的认识，既注重精神上的贯通，又点明实务上的分别，堪称洞见，颇可与今之“儒式民主”论者对话商榷。

复观先生的文字显示，真诚的哲人也会有弱点。对于学术异见常生出“正义的愤怒”便是其中之一。复观先生对于西化派言论之不容，正犹之乎西化派对传统派之痛斥，他们分别给

对方戴了一堆夸张的帽子,似乎离开了学术争议范围,未见宽容大度的气质,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现象,今人当持平看待。

《全集》规模宏大,瑕疵在所难免,特别是多篇文章重复收录之情形,期待重印时加以清理,完而善之。



(文章原刊:中华读书报)

《徐复观全集》书目:

- 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诗的原理》;
-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
- 三、《中国思想史论集》;
- 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 五、《中国艺术精神》、《石涛之一研究》;
- 六、《中国文学论集》;
- 七、《两汉思想史》(一);
- 八、《两汉思想史》(二);

- 九、《两汉思想史》(三);
- 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 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 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 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 十四、《论知识分子》;
- 十五、《论文化》(一);
- 十六、《论文化》(二);
- 十七、《青年与教育》;
- 十八、《论文学》;
- 十九、《论艺术》;
- 二十、《偶思与随笔》;
- 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 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 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 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
- 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 二十六、《追怀》。



没齿无怨言

◎ 王文昌

孔子对管仲还是十分偏爱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便是。职业的原因，读《论语》最喜孔子对管仲的一句评语：“人也，夺伯氏骍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篇》）

孔子对管仲还是十分偏爱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便是。

职业的原因，读《论语》最喜孔子对管仲的一句评语：“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篇》）

法律人以定分止争、建立和乐人间秩序为追求。以此为出发，法律人一定是受人尊敬的群体，司法一定是受人景仰的职业。现实并非如此。良好的目的不一定产生良好和效果，否则我们不会看到民众对于今天司法的激烈诟病，不会看到民众对于司法者的敌视，不会看到一个个执法场面的血腥与残暴。

法律的面孔是严肃的，但是法律的内心是柔软的，设置和执行法律是为了让所有的人生活得更好，更和谐、更有尊严。“柔弱胜刚强”，也只有从柔情出发，法律的严肃才会彰显真正的美学意义，法律的价值才会真正体现——从处罚违法犯罪开始，到尊重法律规则结束。而这样的执法在我们的国度里是有着优良传统的。据《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季羔为士师时，曾经对人施以刖刑，即断足之刑罚。不久卫国发生动乱，季羔逃至城门，守门的正是那个曾被其施以刖刑之人。守门人对季羔说：

“那边墙上有个缺口。”季羔说：“君子不逾墙。”守门人又说：“那边墙上有个洞。”季羔说：“君子不钻洞。”守门人又说：“在这里有个暗室。”季羔便躲进了暗室。等到追兵过去之后，季羔对守门人说：“我以前执法，砍掉你的脚。我今天遇难，你却再三帮助我逃脱，为什么呢？”守门人回答说：“您砍断我的脚，是因我罪有应得，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在案件审结，罪行判定，面临行刑之时，您显露出忧愁不乐的神情，看到您的脸色，我就知道您是不忍让我受刑的了。上天赋予您这样的职责，实是天道始然，这就是我佩服您的原因。”

让处罚变成一种艺术，一种让被处罚者真心接受的艺术，这是我们所有执法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处罚不是从悲悯和真正的公正开始，不能触及被处罚者的心灵，处罚就变成了生冷的敌视。这样的处罚会让被处罚者心生怨恨，仇恨会遮蔽他们心灵的阳光，法律的仁慈会荡然无存。一旦遇到合适的阳光和土壤，仇视法律的种子就会萌发。

还是在2013的正月初八，在重庆出现了温暖的一幕。重庆渝北区的两名交警在处罚一名违反交通规则摩托车驾驶员时，从衣着

举止上发现对方生活拮据,于是在开出罚单之后,又在罚单中夹送了罚款——100元现金。虽然没有更多的报道,但是“生活拮据”的违法者面对这样一张罚单,一定会心生感动。新春时节里一件小小的执法故事让我感受到了法律春天的温度。

还有类似的一幕。北京一名交警清晨上岗,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闯红灯。交警上前制止了违章,并开出一张20元的罚单。于是处罚者与被处罚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违章的妇女在大喊大叫,称交警是小题大作,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交警指出了其违法行为,这名妇女辩称自己家境不好,早晨急着上班,我也不是故意违章,坚决表示不愿意接受处罚。

此时,交警没有沉下脸来,也没有言辞激烈地批评,而是把妇女叫到一边说:“你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我可以理解,只是你不遵守交通规则,危害最大的是你自己。万一出现了事故,你连照顾家庭的机会都没有了,你又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你没有零钱,我可以先替你交上罚款。说完,交警快步走到处罚车上交了罚款,

把罚单交到这名妇女的手上。

于是出现了下面的两个场面:一是这名妇女眼含泪水离去;二是当天下午,她把20元钱送到了交警的手上。

两个相近的故事,同样的法律温度,述说着同样的一个执法的道理:法不徇情,但要循情。这个道理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中面对火烧赵家楼的北大学生,梁漱溟一语道破:政府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者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进行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之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法治的终极目标是全体公民对于规则的自觉遵守,而其中执法者的态度、艺术、效果与此紧密相联。执法、司法者不可细细玩味孔子对管仲的一句评语:“人也,夺伯氏骍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

(作者为辽宁省朝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
王文昌)



新旧嬗变的时代

◎ 宋晨希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近几十年,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往往偏见多于常识。很多人知道,新文化运动促使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但是,到底从1915年到1919年,这四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近几十年,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往往偏见多于常识。很多人知道,新文化运动促使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但是,到底从1915年到1919年,这四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的思想又发生了什么改变?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曾有学者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常识。在我看来,于近代史研究,回归常识,就是颠覆常识,颠覆我们多年来对很多事件的错误认知。叶曙明先生《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则以最好的证据说明了“颠覆”的重要性。叶曙明先生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多部响当当的著作问世。叶曙明常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这让他大笔如椽,文笔流畅,大有一气呵成之感。常年在史料中摸爬滚打,也使其具备了与古人对话的机会,并提出很多独到的新见解。

叶曙明将五四运动爆发的因子上推到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是近代一切事件和运动的“导火索”。梁启超作为改革的急先锋,率先在戊戌之后,提出要好好学习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但作为读了半辈子“孔孟老庄”的人,他也还只能是调和

中西方的思想。

但梁启超的后辈们,则完全没有了这种顾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因为囫圇吞枣的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直言要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语言、戏曲入手,从而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和政治体制。“五四”那一段人,动则大谈政治、文化,心中怀抱着理想的乌托邦,似乎只要把语言改成白话文、拉丁文甚至“爱斯不难度”(世界语),把三纲五常、孔家店推翻,引入西方的民主自由,就可以见到中国未来的曙光。这正如叶曙明在书中所说,大家还处在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中,思想也充满着天真的一面。

“五四运动”其实也是在这种偏激的思想之下所发生。香港大学教授徐国琦先生曾提醒我们注意,对于“五四运动”的发展,不能只关注国内的发展形势,而忽略国际对中国国内的影响。但是国内很多人对五四爆发的认知,还停留在是因为北洋的北京政府卖国,把山东权益让给日本所导致的,并不了解欧洲列强为何会执意要把山东割让给。

叶曙明在本书中,直言不讳,认为山东权益的丧失是因为“弱国无外交”,以及对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太过轻信。此外,叶

曙明书中还有一点,我觉得读者不可不注意。就是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曾与日本签订了密约,即日本有权在山东筑路,驻军青岛、济南。这给予了日本侵占山东的合法借口。

最终,学生们于五月四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打算到东交民巷外交使馆去示威,陈述理由。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当时学生们已经抱定了火烧赵家楼的计划,但在叶曙明的书中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学生领袖傅斯年等人,只是和平请愿,但激进的学生则冲进赵家楼,殴打了当时的巴黎和议的代表章宗祥。

后来说,五四学生运动失败了。但事实是,学生们激进的游行和请愿让北洋政府不断让步,最后,所谓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罢免,被逮捕的学生们也被放出。后来徐世昌辞职,也或多或少与五四运动有关。正如叶曙明在书中所说,“‘五四时代’的北京政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与制度完善的民主国家没法比,但与它的前任相比,还是进了一大步”。(第254页)

五四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阵营的分裂,胡适等人逐渐地认为,对于中国的问题,不可操之过急,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则对此颇为反感,认为没有

主义,则没有奋斗的目标。细究他们的言论,其实“疏通而同归”,只是因为彼此太过急切,导致当年共同创办《新青年》的一干同人最后分道扬镳。

叶曙明在本书中,关于陈炯明的叙述不啻是最值得关注,也是最值得人们的反思。看得出,叶曙明对于陈炯明有着颇多的同情。陈炯明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完全被大家脸谱化了,仿佛是那个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叛徒。但陈炯明是真正有理想,有信念,并付出了行动的人,陈炯明在广东搞地方自治,反对军治、党治,提倡民治,花大价钱兴办教育,并积极延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可以说,陈炯明是真正把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落实到实处的人。但可惜的是,最终因为孙文的干涉,陈炯明沦为了千古罪人。“他的成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失败”。

叶曙明虽然没有为我们点明,但是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自戊戌以至陈炯明的失败,这20年间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法过程,即从所谓的“中体西用”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全面反传统,在到最后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余英时先生曾说,“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

毀了中国传统 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也许这是“五四”那一代学人的困局,更值得我们现在人所常常反思与思考的吧。



为什么读历史？

◎ 曾纪鑫

历史,虽然是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烟消云散,但对今天生活着的每一鲜活的个体生命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历史,虽然是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烟消云散,但对今天生活着的每一鲜活的个体生命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人类并非从天而降,凭空而生,而是从远古一步步地发展进化而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次重要转折,无论多么久远,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刻下了一定的烙印。历史就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绵绵长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总之是从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便“身不由己”地跌入其中、陷入其中、融入其中了。

历史“活”在我们置身的现实之中,现实便是历史的浓缩与延伸。历史积淀的成果是文化,文化赋予人类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方面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脱胎而来,自第一声长啼开始,就有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我们的人生。

因此,那已然消逝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包蕴着相当密集而丰富的信息与内涵,这些信息与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历史

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尽管已经发生的一切无可更移,尽管历史的影响相当深远,但并不等于我们只能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历史的阴影与宿命下蹒跚起舞,而是可以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内在潜力,以史为鉴,创造超越往昔的新的历史。于是,正确地认识历史,对今天生活着的我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谈论历史时,常免不了提出多种假设:要是没有某某人物出现,要是没有某某事件发生,要是历史朝另一个方向稍微一拐,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实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

其实,这种种假设,便是历史的偶然性。历史偶然往往通过某些代言人予以体现,这些代言人便是人类的强者,历史的弄潮儿——伟人、英雄与豪杰。

透过纷繁驳杂的偶然表面,在历史的内里,又分明贯穿着一条清晰可现的脉络,一种颇富意味的规律——这便是历史的必然!

偶然与必然相互结合,历史才显出它的汪洋恣肆与斑斓多彩。



偶然在历史进程中固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环境、气候、种族、时代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像一条红线,总是那么突出地贯穿于古今历史之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呈螺旋状态势向前行进。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亚细亚文明系统,与以古希腊为源的西方文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历史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早就化为股股云烟飘散、消失在历史深处,犹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创,再大也可被时间缝合、痊愈。

巨创不再,但伤疤永存。这疤痕就是代代

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它们形成一种民族潜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断地作用于历史、影响到今天,无声无息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信仰之中。

回望历史是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历史是为了变被动人生为主动“出击”,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果有一天,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客观必然全在人类的认识与掌握之中,从而择优选取最佳时间、最佳人物、最佳途径等机动、可变的偶然因素,按照人们认可的理想模式加以改变、创造,那时的人类社会,当是一番怎样的光明与灿烂?

JZHPRESS,悦读九州

选摘自《历史的刀锋:11个人的中国史》

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内容简介：

本书从改变历史的角度，解剖十一位历史的代言人，从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历史偶然中寻出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把握历史脉搏与发展线索，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发展的斑斓图景，透视中国历史的千年宿命。

作者简介：

曾纪鑫，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代表作有《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等。



王阳明造象
錫孔道久嘯
一葉新正
張
張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王阳明：何为知行合一

◎ 蔡仁厚

据《阳明年谱》的记载，阳明在龙场悟道之次年，应贵州提督学政席元山之聘，主讲贵阳书院，开始提出“知行合一”之说。

据《阳明年谱》的记载,阳明在龙场悟道之次年,应贵州提督学政席元山之聘,主讲贵阳书院,开始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但学者未曾经历存养省察的工夫,对于阳明指点知行本体的“知行合一”之训,把握不住,所以“纷纷异同,罔知所入”。

三数年后,门人徐爱犹未解知行合一宗旨,与同门往复论辩而不能决,于是请问于阳明。《传习录》上载: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地便罢。”

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

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

今苦苦定要说明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思?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思?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知行本体”即是良知本体,亦即是心体。知行本体的自性原本是合一的,它所以不合一,是因为被私欲私意所隔断,所以必须有“致”的工夫以复其合一之体。

有些人虽知父母当孝而却不能孝,他之所以知归知、行归行,并不是知行真的为二而不合一,而是他的知行之体(本心)被私意隔断了。有了私意阻隔,他那孝亲的良知便不能“致”,不能致即是不能行,既不能行孝,便算不得真知孝。若是没有私意隔断,则其孝亲之良知自然能“致”

于父母而表现为孝行,如此,便是“知行合一”,便是复得那知行本体了。《大学》举“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以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这个“真知行”即是知行的本体。阳明引述《大学》此言以指证知行合一,最为亲切。



阳明又说：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传习录》上）

吾心之良知，是知善知恶、好善恶恶的。知善知恶是“知”，而好善恶恶则是“行”。当我心知善恶时，便已好此善、恶此恶了，所以说“知是行之始”。（这意念萌动处的内部之行，可以称之为意念心行。）

反之，当我实好此善、实恶此恶之时，则不仅表示我知善知恶之知为真知，而且表示我这知善知恶的知，业已具体落实而成为真实的行为了，所以说“行是知之成”。这时的行，已由内而形诸外，而表现为视听言动的外部行为。内外通而为一，亦就是知行合而为一。

总之，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知的过程与行的过

程是相终始的。因此，知行功夫只是一事。知此善时便已好此善了，反之，既好此善当然表示已知此善；只要不为私意私欲隔断，知行本就是一而非二。

所以阳明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若识此宗旨，说知行做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否则，便说做一个，亦有甚用，只是闲说话。”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便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常人将知行分作两件，故以为意念是意念，行为是行为，心中虽有不善之念，只要尚未做成不善之行，便自我原谅，不知警惕。殊不知“正行”必须从正心诚意做起，心体虽无不善，但心所发出的意念却有善有恶；作善作恶之几，正在此一念发动处。一念之微，即是圣凡正邪分界的关口，不可不慎。

阳明曾说“知善知恶是良知”。意念发动处的善恶,良知自然知之,这是“知”;善念恶念既已萌动,便是行为之始端,也就是“行”了。所以知与行是同时并起的(因为知行本体是一而非二),是“即知即行”的。识得此意,自能随时随事“去人欲,存天理”。意念一萌,便立即彻根彻底将它克倒,不使任何一念不善潜伏在心中。——这就是阳明言“知行合一”之教的宗旨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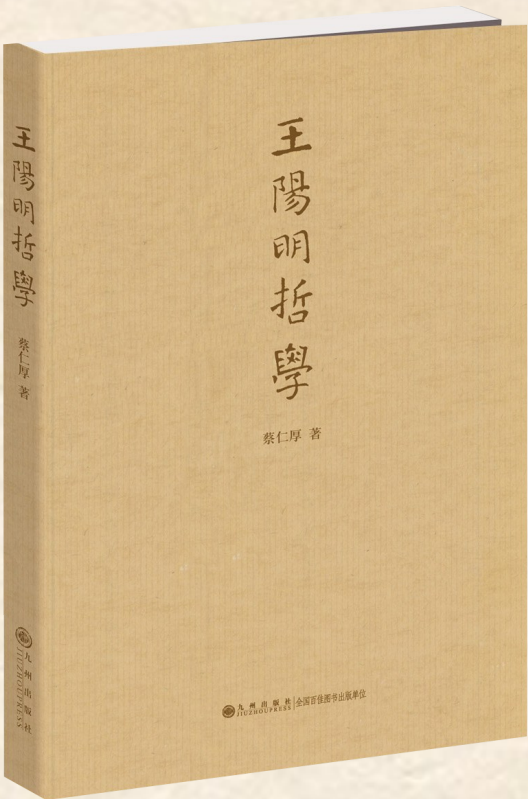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文选摘自《王阳明哲学》

蔡仁厚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内容简介：

《王阳明哲学》提出了很多王阳明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王学的代表作。“四句教”“致良知”“心即理”是王阳明哲学的中心思想,这些思想是如何发展而来?具有怎样的人生意义?明代中叶以后,王学何以成为历史上最显赫的学派之一,甚至传至日本?这些问题,在书中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论述下,都得到解答。



陈寅恪晚年诗中的冯友兰

◎ 谢泳

所有解陈寅恪诗的人,都难免猜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陈诗特点决定的。胡文辉解陈诗最用力,也最有成绩。他的一个看法我极表认同,大意是,解陈诗,不是看你解错了多少,而是看你解对了多少。

所有解陈寅恪诗的人,都难免猜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陈诗特点决定的。胡文辉解陈诗最用力,也最有成绩。他的一个看法我极表认同,大意是,解陈诗,不是看你解错了多少,而是看你解对了多少。

我再进一步说,解陈诗,错也是对。因为错可以让后人避免再走弯路,于学术也不能说没有意义。解陈诗,如果思路对,材料方向对,联想涉及人物为同一类型,结果最后错了,意义也需要肯定。

有此判断,我对所有解过陈诗的人,均表敬意,如果没有他们的学术努力,我们对陈诗的理解就不能深入,就会让陈诗越来越难以理解,就会越来越和陈寅恪的思想与人格有距离。

陈寅恪 1949 年秋有《报载某会中有梅兰芳之名戏题一绝》,余英时、胡文辉均有详解,全诗四句:

蜂户蚁封一聚尘,可怜犹梦故都春。

曹蜍李志名虽众,只识香南绝代人。

此诗余英时解出是写 1949 年 9 月第一届政协会议,胡文辉认为“余说甚是”。我以为诗中“某会”可能不是政协会议,而是当时的一次学术会议,即 1949 年 7 月 8 日,中国新哲学研

究会在北平召开的发起人会议。

会议确定的宗旨是“传播马列主义哲学及毛泽东思想,以期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批判吸收旧哲学遗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于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批判”。冯友兰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会议宗旨与陈寅恪一贯思想不合。

我曾将此诗中“梅兰芳”与章士钊联系,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理解错了。我还说,陈诗中凡出“梅”字,多与章士钊有关,这个判断也不对,但这个思路还不能说没有意义。

我由章才联想到冯友兰。陈寅恪喜欢京剧,但我感觉陈诗与梅兰芳可能没有关系,梅兰芳在陈诗中是一个特殊的暗喻,指冯友兰。这里“梅兰芳”应当理解成“男旦”代称。

1952 年春,陈诗有《壬辰春日作》,其中有句“裴淑知诗一笑温”。余英时、胡文辉皆认为此处“裴淑”是用唐代元稹妻典故,代指陈夫人,也就是说,陈诗的暗喻陈夫人明白,所以“知诗一笑温”。

“曹蜍李志名虽众”用《世说新语》典故,指平庸而无生气的知识分子。“只识香南绝代人”中“香南”本为佛教中地名,陈寅恪《柳如是别

传》中曾说过,明清人多用为字号,此处有可能是暗指冯友兰的字“芝生”,因为“香南”可联想“芝生”。

1960年,陈诗《又别作一首》中再用“何意香南渐消歇,又将新调醉人寰”。此处“香南”当是指人。此诗我也曾错解,现在我倾向于认为也是指冯友兰。“又将新调醉人寰”,很可能指冯友兰1960年发表《论孔子》一文,这些今典释出,诗意容易贯通。

陈诗《男旦》,作于1952年,全诗四句:

改男造女态全新,鞞部精华旧绝伦。

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我原来也理解为章士钊,后结合陈寅恪对冯友兰的看法,我判断也是指冯友兰。“鞞部”是戏班别称,还是借用“梅兰芳”引出“男旦”,暗喻“冯友兰”,“太息风流衰歇后”,此处“风流”不是习语,而是特指1944年9月冯友兰《论风流》,此文曾风行一时。

文中多用《世说新语》典故,陈寅恪最熟悉此书,当时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了解此文的社会反响。此今典释出,后一句即易于理解。陈诗明用梨园习语,语极平常,但语语皆有深意。

陈寅恪1951年《文章》一诗,所指向无定说。我也曾认为是指章士钊,但释出梅兰芳后,我感觉此诗也指冯友兰。“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当年又入时。”此诗“白头宫女哈哈笑”一句,另一录稿是“白头学究心私喜”,恰合冯友兰当时身份,可能过于直白,定稿未用。

关于陈寅恪的这几首诗,刘大年女儿刘潞曾提供过一个材料,胡文辉书中有详细引述。1953年,汪钱曾将几首陈诗带给邓之诚。后由翦伯赞注解,曾刊在中宣部内部刊物上,我曾查阅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宣部内刊《宣传动态》,没有发现,或在其他内刊上。邓之诚判断,这是陈先生谤诗,此点广为人知。如果确有翦注,日后档案解密,这个公案有可能解开。



(晚年的冯友兰)

2.1961年9月3日,

1961年9月3日,陈寅恪有四绝句《赠吴雨僧》,其中最后一首是:

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1961年9月,吴宓去广州看望陈寅恪,分手时陈送给吴宓四首绝句。《吴宓日记续编》记有“寅恪兄赠宓四绝句送别”。《吴宓日记》中没有抄录原诗,这与吴宓一向的习惯稍有不同,可以推测为有所忌讳。《吴宓日记续编》中这四首诗系由吴宓手编《吴宓诗集续集》中补入,吴学昭特别加以说明。

这首绝句在陈诗中非常有名,余英时认为“钜公”指毛泽东,后陈文华认为指郭沫若,余英时认为两说均可从,胡文辉确认此“钜公”指郭沫若。

我认为此“钜公”指冯友兰。解陈诗,引入冯友兰是一关键。解陈诗过程中,我曾引入过章士钊,虽不一定准确,但由章入冯是我思维过程,无章这个过渡,我也想不到冯。

冯友兰写过两本自我总结的书,一本是64岁时的《四十年的回顾》,时在1959年,一本是晚年的《三松堂自序》。前书基本不涉及自己生

平,只回顾自己哲学思想的变化,主要是对早期学术生涯自毁性的检讨。

《四十年的回顾》扉页上有冯友兰题词,恰也是四首绝句,抄出如下:

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

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

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词一扫散如烟。

明月不虑老将至,一悟昨非便少年。

红旗灿烂东风道,禹域嘉名自古留。

赤县果然成赤县,神州真个是神州。

一日便如二十年,卫星直上九重天。

乘风无限飞腾意,急取轻装快赶先。

《四十年的回顾》一出版,冯友兰就寄给康生一册,请其指正。康生回信:“承寄大作《四十年的回顾》,谢谢。接书后,重读了题词,粗阅了序言,觉文章甚茂,责己谨严,多引人入胜之感。甚愿读完全书,以资学习,若云‘指示’,又何敢当。”

1961年,毛泽东接见政协委员并和他们合影。其间毛泽东曾问冯友兰的工作和健康,后冯友兰赋诗一首寄毛泽东:“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群芳。古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成佳话,两派是非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过两篇著名审查报告,对冯著评价很高。依常理推测,陈寅恪应当知道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一书,冯完全否定自己早年的学术,也就意味着否定了陈寅恪早年对冯著的评价,这对陈寅恪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陈寅恪对冯友兰的进退出处,一定有自己的判断。他晚年旧诗中传达出来的对知识分子的情绪,应当说有一部分是由冯友兰变化引起的。

“钜公谩诩飞腾笔”,句中“飞腾”不是偶用习语,而是有意暗指冯友兰诗“乘风无限飞腾意”。“不出卑田院里游”一句,“卑田院”,胡文辉古典解释甚详,原意为佛教寺院救济贫民的地方,后泛指收容乞丐之处,此处暗喻中国大学教授在当时大学中的可怜处境。

陈文华曾指出陈诗“钜公”,典出于李贺杂言古诗《高轩过》,原句是“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其实这也是陈诗一极妙暗喻,“东京才子”中“东京”是开封旧称,开封原为河南省会,此处代指河南,李贺是河南人,冯友兰也是河南人。

1965年5月,陈寅恪重理自己旧著,编为《金明馆丛稿》两编。他在编完1932年《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后,专门补了一则“附记”,回忆自己早年为清华考生出“游园惊梦”和“孙行者”对“胡适之”的旧事。

叙完此事后,陈寅恪写了这样几句:“又正反合之说,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

此话中又涉及两件旧事。一是1934年,冯友兰访问苏联,回国后大加赞扬,为此事还被关进保定公安局几天,幸得何应钦处理,才得以免除更多牢狱之灾。此后冯友兰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认同辩证唯物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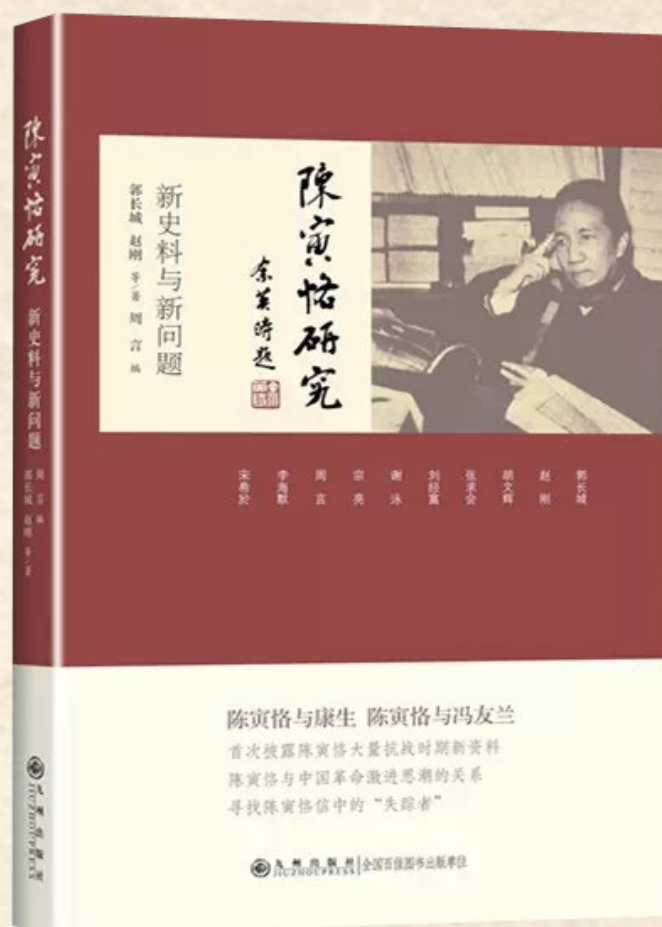
二是陈寅恪给刘叔雅信中讲为何要出“对对子”题目时,曾认为上等的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因为提到了“正反合”,陈寅恪特别注明“平生不解黑智儿(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这其实就是后来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不学习马列”的源头。在陈寅恪看来,“正反合”即怎么变都有道理,这是他一向所反对的。

从陈寅恪简短“附记”的语气中,不难感觉到他对冯友兰的态度,特别最后一句“是更一游园惊梦矣”,包括了陈寅恪对当时现实的诸多感慨,自然也曲折表达了对冯友兰进退出处的判断。吴宓是陈寅恪清华旧友,冯友兰也是老清华。晚年朋友相见,叙旧为先,结合陈寅恪对冯友兰思想的评价,“钜公”恰合冯友兰身份,“飞腾”为冯诗原词套用,这些暗喻均合陈诗习惯。此今典释出,此诗易于通解。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篇内容选摘自《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九州出版社出版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内容简介:

本书是继《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之后,陈寅恪研究领域又一力作。

在新史料方面,披露了陈寅恪1937年至1945年间的照片、聘书、藏书、书信等珍贵史料,这些史料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不仅可以管窥陈寅恪的治学路径,也可以观察这位学者平时的生活细节。

在新问题方面,既有胡文辉、张求会、李海默等学者对陈寅恪晚年诗的重新解读,又有对围绕在陈寅恪周遭却隐没在历史之中的“失踪者”的深入考察。本书不仅拓宽了陈寅恪研究

的新领域,而且拉近了读者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人格风骨之间的距离。

本篇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

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后任《黄河》杂志社副主编,转而研究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出版过《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著作。

2007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历史上的“四方”较量

◎叶曙明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环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赋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天气受东南方低纬度的太平洋气候影响,温暖潮湿,雨量充足,在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冲积土,土质肥沃,人口稠密。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而西风气流则非常强盛,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风沙弥漫。



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会无缘无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地理气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地理气候不同,的粮食也不同,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小麦为主,水稻

与小麦的种植区,大致以长江为分隔线。粮食构成的差异,一个吃米,一个吃面,也是形成南北民俗和民风各异的原因之一。

海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在近两三千年内,经历过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两个伟大的文明时代。黄河文化从西周走到秦、汉,趋于饱和,然后走下坡路;唐、宋时代,长江文化崛起,走到北宋晚期,达至顶峰,然后又趋于饱和,经蒙元的摧残,渐走下坡路,文化与经济的重心,继续南移。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便是看到中国文化已移到了南海之滨,前面是茫茫大海,再无处可移了,唯有与南宋偕亡。

北方从来都认为南方有资格承载中国的正统文化。站在黄河文化时代的中原角度去看,愈往南行,则离文明愈远,五岭以南是全中国最边远的蛮瘴地区,那里只有“短发纹身、口吐鸟语”的野蛮人。

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情形则恰恰相反,愈往南行,离世界愈近,翻过了五岭,拥有四千多公里海岸线的广东,是中国与世界相接的最前沿。到明、清时,随着世界海洋文明的兴起,中国的文化重心,移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第三个文化高峰——珠江文化。



(珠江流域)

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这里已经微乎其微。这种泾渭分明的地理结构和文化迁移路线,对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洋从来是南方人托命之所,所以他们对海洋有着本能的依赖,而对长江以北,则抱有天然的警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征讨岭南,这五十万大军,是由北方的罪吏、逋亡人、赘、三代之内有商人户籍的贱民组成。他们在平定岭南之后,马上掉转枪头,烧绝栈道,自立为国,与北方为敌。

尽管汉武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但朝廷依然把岭南作为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这是造

成南北在政治上长期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南方人眼里,凡从长江以北打过来的,无论是秦始皇的五十万大军,还是汉武帝的金戈铁马、抑或蒙元铁蹄、满清八旗,都是在破坏他们的家园,留下的都是惨痛的战乱记忆。

历史学家在谈论岭南人的家世时,常说他们都是中原迁徙而来的,似乎以此证明南蛮子其实与“河南世泽,渭水家声”是一脉相通的,出自同一个文化体。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这些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几乎没有谁是自愿的,不是被朝廷贬谪、发配,就是因战乱而逃出家園,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人人心境都是阴郁的、悲凉的、怨忿的。

纵观历史,每当北方进入周期性天下大乱之际,如两晋五胡十六国、安史之乱、残唐五代、北宋末、南宋末、明末,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难到南方。



(东晋南迁移民分布图)

这些人既有对北方宫庙城社的缅怀,更有家破人亡留下的悲惨记忆。岭南人重视“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虽然不无对北方故土的追思之意,但亦有对宗族血脉在南方得以传承与兴旺的期望,背后隐隐透出一种“你要我死,我偏不死”的倔强心理动机。

在南方的民间传说里,可以找到大量先人在北方被残害、追杀、驱逐,流落到南方的记录,对南迁的记忆,绝不是愉快的。南方许多地方都有捡骨再葬的风俗,即把死者先用棺入葬,等肉身腐化以后,再开棺捡出骸骨洗净,入埕安葬。改葬之俗,岭南地区甚盛。有些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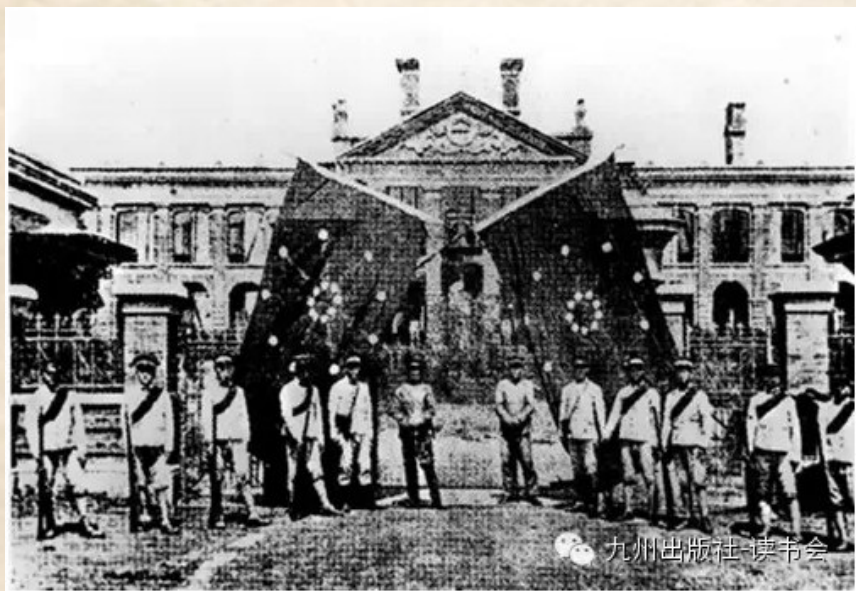
方,还会葬完再葬,屡经起迁,遗骸残蚀,仅余数片,仍转徙不已。这种习俗,便是源于中原人背负先人遗骸,辗转万里南下的经历。

北方对他们来说,又爱又恨,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纠缠着十分复杂的感情。试想,这么多心怀怨望的人,背着祖先遗骸,汇聚到南方,通过宗牒族谱与口耳相传,对北方的“选择性记忆”自然根深蒂固,成为南方的文化基因之一。他们虽然知道自己身上可能会有“河南世泽”的血统,但更愿意强调自己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

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南方人倔强、坚忍、充满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宋、明末年,游牧大军在北方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南方,却遇到最顽强的抵抗。南宋、南明最后都灭于广东,这不是偶然的,南方人不肯做顺民,不肯向外族屈服的性格,往往成为文化命脉存亡绝续的最后防线。

南方的文化也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南方人有一种不肯认命的性格,对命运有一种天然的反抗,他们把自身的反叛性带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也在

南方传播和滋长开来,一旦从海洋吸取到外来的养分,马上会膨胀发酵起来,直接挑战北方正统。这种情形,已被太平天国、同盟会革命、国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发动的政治运动所一再印证。



(在广州点燃了近代民主革命之火)

然而,当我们在审视南北文化的时候,不可忘了,中国幅员辽阔,除南北之外,还有东西文化的区别。东部文化以江苏、浙江为代表,西部文化以陕西、甘肃为代表。东部带有鲜明的长江文化特征,而西部则更多是黄河文化的特征。

上海是一个值得好好发掘、认真研究的地方,它和广东一样背靠海洋,但夹在南北之间,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血脉里,混合着南北与海洋的各种基因,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强、独立,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大气。它灵活、圆通、善变,无论是北洋当政,还是国民党

当政,都能够左右逢源,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典型标本。

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整天高喊“南征”,南方也整天高喊“北伐”,一个要“武力统一南方”,一个要“饮马长江,扫荡黄河”。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北大决战中,东部地区时而支持南方,时而支持北方,最终倒向南方,成就了国民革命的北伐胜利。

正当东部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东北,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淞沪抗战,国民政府迁往洛阳,西安事变,有如急风骤雨,令中国整个政治地理格局,突然间完全改观了。

东部这颗明星一夜陨落,而西部则像太阳从黄土高原的背后升起,河汉倒流,天地翻覆,那一年,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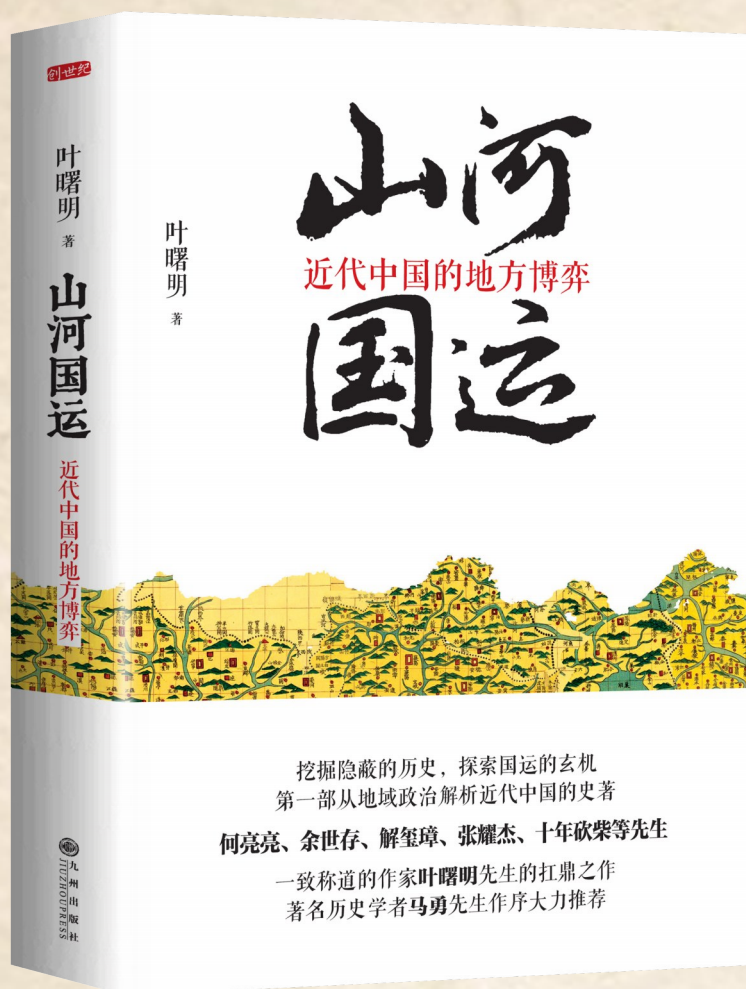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文选摘自《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

叶曙明著,九州出版社出版2014年10月版



扫描左侧二维码,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四现场》《中国 1927 • 谁主沉浮》《国会现场》《草莽中国》等。代表作《山河国运》，建立了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分析框架，于众多相关著述中别树一帜。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止于西安事变，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系统地在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简介：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大变局：1911》《重返五



（钱穆先生和他的夫人钱胡美琦）

下跪和中国人的尊严

◎钱胡美琦

人的尊严,应该分三层讲,一是“生命”的尊严。生命赋自天地大自然,飞禽走兽,对其生命,各有尊严,人有他的生命,即有他的尊严。我们不能无端抹杀某一生命的尊严。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
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

——钱胡美琦

这几天在报上看到有关一北商专校长痛于学生犯错不知惭愧,自己带头,向国旗及国父遗像下跪忏悔一事引起社会不同议论。报导中说:“有人认为这事有伤学生自尊心及体面,有人认为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学校体罚学生,校长的作法无异是一项严重的错误,采用下跪更是错误。”读后感触良多,引起我们夫妇“闲话”,特以“人的尊严”为题,谈谈我们的管见。

人的尊严,应该分三层讲,一是“生命”的尊严。生命赋自天地大自然,飞禽走兽,对其生命,各有尊严,人有他的生命,即有他的尊严。我们不能无端抹杀某一生命的尊严。但在人的世界里却更有一个“人格”的尊严,照中国人传统的讲法,这是“人性”的尊严。



“人格”二字是西方人所使用的,实际上,人格尊严是紧接着生命尊严而来。有一个人格即一个生命,我们要保障其生命,连带及于其财产等一应具体事项,其保护方法,则凭法律。所以西方人讲“人格”,实际上是一法律名辞。每个人都有他的人格尊严,如果他犯了罪,损害了他人的生命及财产等,定要经过审判由法律来裁决他的罪,这是西方文化传统如此。但我们东方传统并不认为每一人格都有他“无上”的尊严。中国人在人格尊严上更看重“人性”的尊严,这与西方人讲人格尊严有所不同。

“性”是天生的,一个生命有一个性。可是生命是发展的,从婴孩到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生命发展,人性也随之发展。发展人性,应有一更高的理想,要待“人性”的发展达到了某一个阶段,才始完成他“人格”的尊严,亦完成了他“生命”的尊严,这是有关教育上的问题;因东西双方对人生看法不同,所以西方人从开始就看重“法律”,而东方人从开始就看重“教育”。可以说,法律是保障生命的,教育是培植人性的。培植人性,也可说即是培植生命,培植人格。因为人性就在人的生命里,就在每一

人的人格里。

例如一盆花,一棵树,一枝一叶须我们的修剪,甚至一枝上三朵花苞,有时得修去两朵,好使这棵树这盆花长得更像样,开起来更悦人,难道这会违犯了花树生命的尊严吗?毋宁是说,相反的,这是要更完成花树生命的尊严。因为在修剪过程中,加进了人的一番理想,即所谓“文化的理想”,中庸上所谓“赞天地之化育”。

中国人说这一番理想,也即是天的理想。在天的理想下,要经过人文来培植,来成长。换言之,天的理想要经过人的培植与完成,才见其尊严。有天无人,一任自然,即无尊严可见。

譬如我们布置一个园林,栽了这棵树,旁边别的树便该取消。种了这朵花,旁边别的花也要取消。其它的杂草杂树都要取消,要使所培植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花都完成了它的尊严,这一个园林也有了这一个园林的尊严,不该任杂草丛生地乱长,一任自然,甚至可无花树,也无所谓园林布置了。



栽树种花布置园林如此,人的教育也一样。在学校教育之前,先要有家庭教育。小孩生在家庭中,有他生命的尊严。他虽是一小孩,也有他人格的尊严。但是这个“生命”与“人格”,还需要人类的文化教育来培植,来完成。譬如说,小孩在家应懂得“孝”,这不是父母私心要小孩如此。“孝”是一种天性,小孩懂得如此才像样。

子女生在一个家庭里,懂得对父母尽孝,这个家才是一理想的家,这个小孩才是一理想的小孩。孩子不孝,做父母的就得指点他,教训他,要他孝。这孝道,从小就需培养。譬如一家人同桌吃饭,这小孩不顾父母兄姊,一人肆意先吃,这便是不孝不悌,父母兄姊就该加以制裁,要教他等待父母兄姊先下筷子才跟着吃;这并不是损害了孩子的尊严,正是要培植完成他的尊严。

孩子不听命,父母严词训斥没有用,只有罚他下桌,不许吃,这是一种教育手段,教育方法。小孩受了教,才慢慢会懂得做人。教育须从小培植,就很省力。待他年龄大了,习久成天性,他都懂了,在家做一孝子,入则孝,出则悌;进入社会,也是一个举止合度的人。这种生命,

这种人格,才是最尊严的。好多孩子,生来就不懂得孝悌,就不懂得坐上桌子吃饭该等待父母兄姊先下筷,这是要家庭教育来培植的。

孩子长大了进入学校,当然有他的生命尊严,有他人格的尊严,但更重要的,在其“生命”、“人格”的尊严之上,更应有一个“人性”的尊严。中国人说,这是“人品”的尊严。“品”是有高低等级的。



学校的重要,在教育学生有“品”,不是仅教学生有自由。教育是有理想,有选择,有标准的。教他这样,不教他那样;培育他这一面,不培育他那一面,背后有教育理想。不讲理想,何必办学校,何从施教育?学生从楼上扔东西向楼下,此事应否管教?学校讲教育,此

等处自该管教。如果说管教学生便会损害学生的尊严,则不知楼上扔东西的学生有尊严,楼下过路的人是否亦有他们的尊严?

有人说,扔东西没有打伤打死人,照法律规定,只应罚六百元。但任何一个社会,不能只有法律、没有教育。每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不进法堂,可是不能不要家庭,不进学校。纵然法堂裁判扔东西的学生可以一元不罚;但学校教师对此学生仍应管教,仍应处罚,这是教育。

中国人讲“人性”,孟子讲人性“善”,荀子讲人性“恶”,后来又有人讲人性善恶混。究竟人性是善,是恶,是善恶混,在此且不讨论。但孟子讲人性善,说人应该教,荀子讲人性恶,也说人应该教。性善要教他不向善,性恶要教到他懂向善。孟子因主性善,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因主性恶,所以说每一个人要“守礼”“守法”。要教人懂“礼”,也懂“法”,在家庭,在学校,在教育。我们不能只讲法,不讲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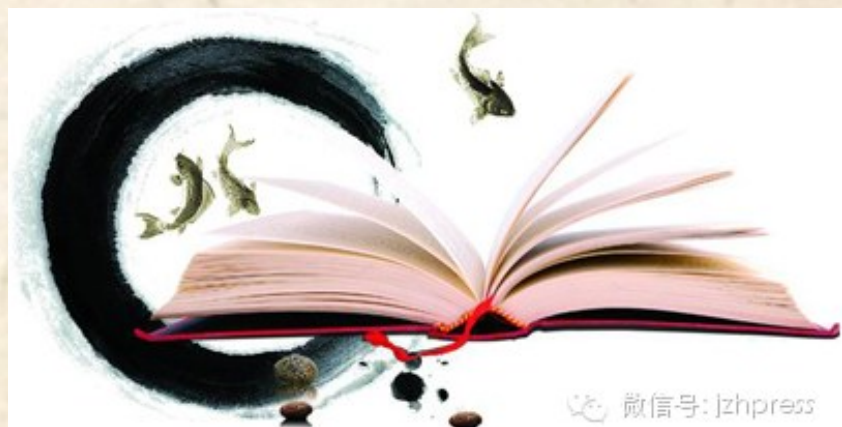
法庭与法官警察只讲法,在家庭,在学校,就应多讲礼。家庭学校讲了礼,人人跑进社会,懂得讲“礼”,“法”也可退处一旁。这个世

界才是一个理想的好世界,这个社会才是一个理想的好社会。如果大家只看重法,不讲礼,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好。

讲“法”也该从广义来讲。一种是政治上所规定、法堂上所执行的,另一种是学校教师也有法,更一种是家庭父母也有法。一个家庭该有它的家法,不能任由孩子来自制法,也不该让孩子无法无天。行为不端,只望警察来管,父母不能管,学校师长不能管,说管了就损害了孩子们的尊严。这道理说得通吗?

我们对一件事,应先辨是非。就商专这件事来说,商专校长至少怀有一番教育的心情。这不仅对扔东西的学生,即对全体学生,也都有一番教育意义。假如教育当局认为校长处置不对,应提出一方法,使每一学校负责教育的人都有一方法可守,使学生们不致如此放纵。然而人事是很复杂的,古今中外也都没有一套死的方法来限制负责教育的人。施教者与受教者,各有其不同的处境,与其不同的性情,所以不能用一套死的方法来教育。有的学生,只需好言相劝。有的学生,非严厉管制不可。不仅学校,乃至宗教团体也一样,教会也一样可以开除神父牧师或修女。

孟子说:“不屑之教诲也者,亦教诲之也”。这仍是一种教育,只是一种严厉的教育。中国古人说:“擯之四夷,不与同中国。”这个人实在太坏了,纵不杀他,须赶他出国,这也是一种严厉的处罚,但也同样是一种教育。我们现在,则学校不许开除学生,又不许处罚学生,试问对于一些不守秩序,不遵规矩的学生,有甚么更高明的方法来贡献给学校的师长们,也教师长们保留得一些尊严?



中国古人讲“天、地、君、亲、师”,法律只是政府所定,我们不能只要有君,再不要亲与师。现在大家反对专制,要讲民主,家庭与学校不是比政府法堂更接近民主吗?若在家要顾到孩子尊严,而不顾父母尊严,那家又如何存在?在学校,要顾到学生尊严,而不顾师长尊严,那学校又如何存在呢?似这样的社会,

不尊父母,不尊师长,只尊法官与警察,试问社会尊严何在?整个国家民族的尊严又何在?难道民主精神便是如此吗?

至于讲到“下跪”,有人认为处罚学生下跪,更是校长的过错,但下跪也是一种“礼”,比较握手、拥抱、鞠躬更显得庄严虔诚。中国人自古对祖先对父母表示最上情感的方式都下跪。对不孝子孙罚令下跪,也是一种教育方法。现在人认为封建。但下跪之礼也不是只有中国人用。西方人对上帝下跪,天主教也对神父下跪,我们没有人敢批评,难道我们对国旗、国父遗像下跪,便该批评吗?

每当在殡仪馆看见孝子们也和吊客们一般,只向死去的父母行鞠躬礼来表示他们最后的敬礼,我心里就自然泛起无限悲伤,毕竟父母不同于一般人,三鞠躬不足以表示我们对父母逝去的哀思。鞠躬下跪,固只是一种形式,然而人的无限情感却可依靠此形式来表达。那下跪至少也表达了我们私人人性的尊严。商专校长教学生们对国旗、国父遗像下跪,也只要教青年学生们接触到一种“人性尊严”的肃穆心情。所以校长亲自下跪,并不损伤校长之尊严,又何尝损伤了学生们的尊严,更何尝是用来作一种体罚呢?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内容简介

《楼廊闲话》以关怀社会和人生问题为主旨,探讨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中国人应守和必守的常道。涉及教育、做人、幸福等方面,包含诸如守旧与开新、奖励与惩罚、人的尊严、职业精神之类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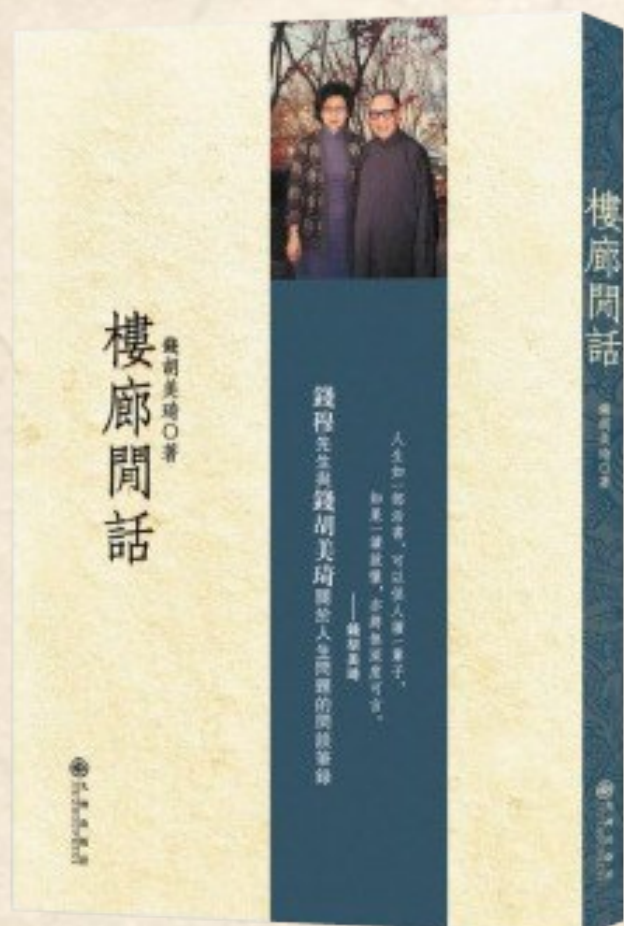
《楼廊闲话》中内容由作者钱胡美琦与钱穆先生在日常闲居中交流切磋而来,其观点也映照出钱先生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疼惜与执著。

作者简介

钱胡美琦(一九三零——二零一二),江西南昌人。一九四九年随家至香港,成为国学大

师钱穆先生的学生。一九五零年迁居台湾。一九五二年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再至香港。一九五六年,与钱穆先生结为伉俪。一九六七年,随钱穆先生定居台北士林外双溪素书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在中国文化大学讲授中国教育史,后与钱穆先生共同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普及。一九九一年,召集成立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禅心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个人著述主要有《中国教育史》《楼廊闲话》等。





中国历史十大政变

◎释然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政变作为国家内乱的主要形式,与兵变、民变(或称农民起义)交替发生,成为困扰统治阶级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政变作为国家内乱的主要形式,与兵变、民变(或称农民起义)交替发生,成为困扰统治阶级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把防止政变作为执政的主要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相应的政治制度,然而政变却一直没有消除,并最终为推动封建社会的灭亡发挥了重要作用。

1 . 赵高政变

赵高政变,是秦始皇身边的宦官赵高煽动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胁迫丞相李斯所发动的夺取皇位的政变。政变发生在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死后几天的时间内。

秦始皇临死前,虽然没有明确立长子扶苏为太子,但令其回咸阳主持丧事,也等于明确了皇位的继承人。胡亥在皇子中是最小的一个,在嫡长继承制的封建社会,他是最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赵高、胡亥、李斯合谋篡改秦始皇遗诏,令扶苏自杀,立胡亥为太子。因此,这次政变是一次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政变。政

变后,胡亥登上帝位,赵高虽然只担任中书令,但由于他控制了胡亥,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大权,从此,秦王朝进入了昏君与奸臣联手祸害朝廷的时代。

2 . 周勃政变



周勃政变,是西汉廷尉周勃联合刘邦的后代及故臣,消灭吕后宗族的政变。政变发生在吕后逝世的第四十天(前 180),距刘邦称帝二十二年,距吕后接管朝政十五年。政变中,吕氏全族及吕后所立的少帝全部被杀,代王刘恒被立为皇帝,就是汉文帝。

周勃政变,虽然是忠于刘氏的大臣与刘氏

皇族联合诛灭吕氏的政变,但政变却没有一个核心人物。政变的想法最早出自只有二十岁的朱虚侯刘章和他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最初由刘章的哥哥刘襄以兵变形式发起于边远封国,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及颍阳侯灌婴是在吕氏兄弟的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吕氏必然失败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之后,才参与并联合组织了政变。

这次政变,对西汉王朝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姓为王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组成的法定制度。

3 . 王莽政变



王莽政变,是西汉末年三朝辅政大臣王莽篡夺汉位的政变。政变发生在公元5年至公元

9年,政变中,西汉皇族被残酷镇压,西汉王朝被废除,王莽由安国公到代皇帝,最后登上皇帝宝座,建立新朝。王莽通过政变而没有通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实现了朝代的更替,这在全国处于统一状态下的中国封建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一个新朝代的产生,必然要呈现出一些全新的气象,加之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不进行改革就很难巩固政权,于是王莽依据古代的典籍,推行了全面的改革措施。而此次的改革,既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新体制,又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使民众起义像洪流一样迅速蔓延。地皇四年(公元23)十月,绿林军攻破长安,攻入未央宫,王莽逃到渐台,被冲入宫中的商人杜吴杀死,尸体被士兵们切成若干块。新莽政权灭亡。

4 . 司马氏政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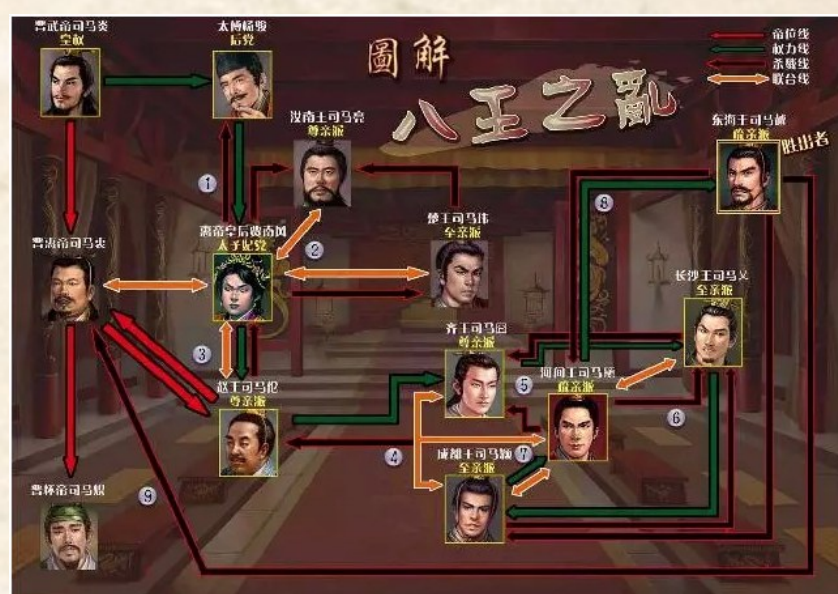


司马氏政变,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推翻曹魏政权,建立晋王朝的政变。政变发生在公元249年至266年,在长达十七年的政变过程中,曹魏势力被逐渐剪除。最后,魏帝曹奂将江山“禅让”给司马氏,司马炎称帝。

三国时期,魏、蜀、吴各国建国虽然艰难,但衰落得却特别快。当魏国的曹氏势力在衰败的路上走了十年的时候,司马懿发动政变,将国家大权从曹氏手中夺了过来,从而扼制了衰败的发展,并带领魏国逐步走向强大。司马懿政变,产生了三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对魏国实施了十

七年较为开明的治理,使三国呈现出一强两弱的格局,魏国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从而为结束分裂局面,再次实现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5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西晋初年贾南凤皇后和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颢、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等相继组织的宫廷政变和兵变。发生在公元291年至306年,政变中,晋惠帝、贾后及除司马越之外的七位诸侯王被杀。政变之后,西晋王朝便很快覆灭。

6 . 杨广政变



杨广政变,是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夺取皇位的政变。政变发生在公元600至604年,政变中,隋文帝杨坚和太子杨勇相继被杀,杨广即皇帝位。但之后十四年,杨广也在自己最信任的大将宇文化及所发动的政变中被杀,隋朝灭亡。

隋朝灭亡的情况与秦朝惊人的相似。这两个朝代都因为推行急政、暴政而引起大规模民变,但在急政、暴政的背后则是权力的滥用。胡亥和杨广都是要享尽天下艳福的人,但这样的福分没有享受几年,就得到身首异处的下场。

7 . 李世民政变



李世民政变,是唐朝初年秦王李世民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并逼迫李渊退位的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政变发生在公元624年,政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儿子全部被杀,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不久即皇帝位,就是唐太宗。

李世民政变,是皇子与太子争夺皇位的斗争,政变的主要原因是二人都具有竞争皇位的实力。

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主要谋划者之一,在建立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都是在其直接指挥下而夺取胜利的,但他却因为不是长子而被剥夺皇位的继承权,他在内心深处是无法接受的。

李建成认为,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他已经是决策者,李世民只是个执行者,统一全国的功劳不能全部记在李世民头上。即使李世民的功劳很大,也不应破坏“立长不立贤”的传统制度,所以他窥视皇位本身就是错误的。

一山难容二虎,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成必然。

8 . 李唐复国政变



公元705至713年,唐朝先后发生张柬之、韦皇后、李重俊政变和李隆基的两次政变,换了五位皇帝,其中有两位皇帝被废,一位皇帝被杀。李隆基杀掉太平公主后,朝廷中的混乱局面才得到控制。在李唐复国时期的系列政变

中,敌对双方的目标都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争夺皇位。

李氏皇族与外戚争夺皇位的斗争,从武则天当上皇后时就已经开始了,大致经历了四个回合。

第一回合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斗争,结果以李治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二回合是忠于李氏的大臣与武则天的斗争。在这个回合中,虽把武则天赶下了皇位,但其实力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李氏虽然名义上恢复了帝位,但朝政大权仍被外戚掌握。

第三个回合是李隆基与韦武集团的斗争。在这个回合中,韦氏后党和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后党被彻底铲除,李氏皇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四回合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

9 . 康熙皇帝政变



康熙皇帝政变,是清入关后第二代皇帝爱新觉罗·玄烨,铲除把持朝政的辅政大臣鳌拜及其党羽,夺回国家最高权力的政变。政变发生在公元1669年。政变中,康熙皇帝将鳌拜擒获后革职拘禁,将其集团中的九名骨干处死,从而为自己大展宏图扫除了障碍。

鳌拜利用调换土地事件杀了苏纳海等人之后,对正白旗势力给予了沉重打击,也使他的势力急剧膨胀。索尼死后,朝政大权实际上已经被其掌握。由于康熙皇帝年龄过小,朝廷官员中又多是趋炎附势、追随鳌拜的力量,难以对鳌拜实施有力的扼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鳌拜坐大。鳌拜的目标就是要将皇帝变成彻底的傀儡,长期维持自己首辅大臣的地位。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国家最高权力夺回来,只有发动政变。

因此,这次政变,是被架空了的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鳌拜之间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

10 . 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清朝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及恭亲王奕訢,剪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政变。这次政变于公元1861年(农历辛酉年)在北京发起,又称北京政变。政变中,八位顾命大臣有三人被处死,五人被革职。政变后,慈禧太后登上垂帘听政的位置,开始了她长达四十七年的黑暗统治。这次政变,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和灭亡。

辛酉政变,是堕落的后宫与腐朽的大臣之

间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
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只能加速清王朝的没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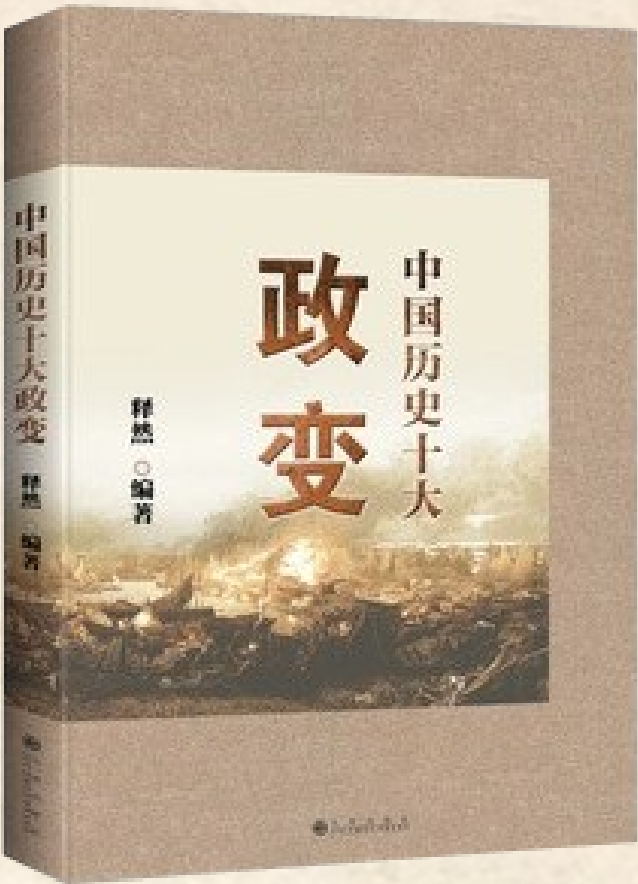
JZHPRESS,悦读九州

选摘自《中国历史十大政变》

释然编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内容简介：

全文正文共分 10 篇，分别是赵高政变、周勃政变、王莽政变、司马氏政变、八王之乱、杨广政变、李世民政变、李唐复国政变、康熙皇帝政变、辛酉政变等，每篇的前半部分是对政变背景、经过、结局的叙述，后半部分是对本次政变的影响、原因、成功要素、教训等进行的分析。



一位情若莲花的女子——走进林徽因

◎ 肖辰

曾经有多少人视林徽因为梦中期待的白莲。她不同张爱玲以文立身，不同孟小冬以艺傲世，但是她的身世氛围却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不管她一生爱过多少人，犯过多少错，又经历了怎样的潮起潮落，人情繁复。她永远傲立于碧波之间，素雅的清香缠绕身迹，温和如玉，生命的轨迹不曾有太多的放纵。

袅袅轻烟，几缕残荷，烟雨中洋溢着清香。有个素衣女子曾赤脚踩过青苔上那抹潮湿，静静的，清风细扫，空气中增添几分感伤，虽然酸楚却也淡然，仿如她的来到静如莲荷，她的离开悄如春水，留下的只是一丝沉静的幽香，绕于心间，挥之不去，锁于梦乡，寂静守护。

一个人，一本书，淡淡的四月天下，他们的约定清若月，静似烟，三生石上写着他们的名字；轮回所中嘹响他们的声迹；或曾徘徊？或曾寥落？当凉风扫过发黄的书页，掀起潮湿的词章，我们煮上一杯茶，倚栏静窗。看细雨扫过青石小巷，燕儿呢喃于梁间，我们会想起这个白衣女子，她以花为容，诗为骨，智为魂，无论人世如何变迁，她都是清晨池塘里那株静莲，坦坦荡荡，清清然，让众人仰望魂锁。而时光微凉，她飘然远去，化身为雾。

我们会记得她的名字，林徽因。来自江南的女子，一生只走过五十一个春秋。先是求学欧美，后至全国各地寻访古建筑。人生的脚步在繁华市井、苍凉荒原上蔓延，不经意地在指间洒落着睡莲样的诗意与才情，或许寥落，或许寂寞，但绝不彷徨，她就是清晨里最清冷的风，带着弥漫的花香轻轻扫过你的鼻翼，你会沉醉，

却无从追寻，因为世间没人能承起风的清傲。

他们都说是三个男人成就了这位女子。的确！是三个男人让我们更深刻地记住了这朵误入凡尘的奇葩。一袭素雅白衣行走于凡尘俗世，她走过的地方鲜花弥漫，蝉儿为她歌唱，雨儿为她起舞，雾色霞翼中留着余温犹存的梦。

当你曾贪恋青林碧水，曾仰慕白云飞絮，但当冬日来临，迎着纷纷暮雪而舒展自己傲人身姿的株株红梅，你会感叹世间竟会有如此炫目的美。红得绚烂，傲得坚贞，完全不屑凡尘俗世的烟火之气。林若莲荷，林若寒梅，林徽因的身上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她的美宁静而高贵，她的智慧独立自持又极富才情。

她以一代才女、著名女诗人、建筑师及国徽主要设计者等身份被人们铭记在怀。她是林徽因，不是三个男人的林徽因。历史悠远，岁月千年，男为主，女为副，封建的观念深入灵魂。人们习惯在男人的光环下去审视一个女人，这样不好！时代在变迁，风文在改变，春水浸泡的铅华早已淡去。宛若春风探访鲜花，呢喃过后焉知花之沉静；细雨清扫丛间，拂吻过后怎道瓣之晶莹。林徽因圣洁纯净，不应该这样被人看待。她不是依附大树的春藤，她的美丽与智慧

足够成就她自己的绽放。

她离开人世已近六十年。花开花落,缘起缘灭,幼枝已成苍天古树,油伞下披满岁月的刻痕,清风回荡廊间巷屿,呜呜中询问尘封的往事。然而四壁寥落,月之回避,红尘往事已关起它的心门,苍凉过后我们仅能但求一份温暖的慰藉。春花冬雪,时光流逝,岁月的巨轮轻易带走一切繁尘俗礼,远离的是何止是一段故事。



林徽因,代表一个时代文化风尚的女子。她的音容笑貌只能在那些陈旧的黑白影像里被后来者瞻仰、想象,她的生活只余下友人的评述,甚至旁观者的曲解中伤。

透着历史的烟幕往回看,尘蒙的是往事传说,浸泡的是人行声貌。春水无情,秋风凄厉,山石草木尚可毫发无伤,我们思念的人却在清茶淡水中清瘦单薄。人生匆匆聚散,百年过后,世间是否还残留有她的余温?

时间在很久以前,她从江南的烟雨巷口走来。巷子里,瓦檐青青、杨柳依依,墨绿的青苔在石缝墙角生长,任由清晨的雨雾轻轻扬洒。潮气太多,诗意更浓,烟锁重楼里她早已悄然远去,像一股清风扫过柳逸,留下的只是淡淡的香,清莹的醉。而时光流逝,此时不知雨巷中又是哪个丁香般的女子在徘徊,是否还有人在那里寂寞张望、惆怅等待。

康桥,一个多雨的地方。异国求学,康桥的雨雾或许能让林徽因寻得一丝亲切的感觉。俨如在杭州,轻烟,细雨,杨柳青青。柳叶扫过碧波,每一次轻拂都是人生美丽的邂逅,似乎从那时起它就在无声地诉说,林徽因的一生会有很多不寻常的际遇!



在康桥,她遇到了徐志摩。是他让林徽因的康桥更添一抹诗意;是他让林徽因的康桥有

了爱的痕迹。烟水迷离,在旷世奇恋里我们不能妄自评说究竟谁负了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丽女子的心智。她知道自己究竟该走哪条路,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她爱徐志摩,却知道他给不起自己要的平和,她决绝地走了,留给诗人的却是一世的牵挂。

她也在那认识了诸如 H.C.威尔斯、T.哈代、K.曼斯菲尔德这样的文化名人。在这期间她在寓所与女建筑师房东多有接触,听到了很多有关建筑艺术的知识,使她对建筑艺术的美好和价值有所领悟,乃至决心将来学习建筑艺术。无论是建筑艺术还是文学艺术,我们总能在她往后的生活中找到康桥的影子。这一段岁月在她的记忆中所占比重能有多少,她是否时常想起康桥?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岁月注定要成为她人生一个不可忽略的转折点。



(徐志摩和林徽因)

青春伊始,林徽因又随父亲回到中国,来到北京。豆蔻年华谁与共,不在梅边在柳边。回到北京后,林徽因就常与梁思成往来,并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一个是貌美如花的江南才女,一个是求学清华的俊美少年。名望之后,众望所归。这样的两人走在一起叫人不能不羡慕。他们是否真的想过,在一起就再也不分开,从此便相约白头?那时的他们应当还是单纯的。林徽因自己也说,当时她自己会在梁思成面前摆出一副少女矜持的样子,而梁思成还做得出自己一个人偷偷爬到树上把林徽因丢在树下的事来。

梧桐细雨,秋思落谁家。就在林徽因回国不久,徐志摩也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从伦敦回到了中国。尽管他知道林徽因和梁思成已经走到

一起,可他还是那样痴情眷恋着林徽因。相思何处?林徽因当真不曾踌躇、不曾犹豫吗?可是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梁思成,和梁思成比翼双飞去了美国学习建筑。留美期间,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扶持,感情越发深厚,于大学毕业后正式结婚,缔结白发之情、百年之好。



(林徽因和梁思成)

风轻云淡,时光总是在手指间不经意地流过,看似恍若却也必然。林徽因与梁思成学业已成,回到祖国,前去东北于东北大学任教。南下的风,轻柔淡雅。北方的尘,粗狂刚烈。林徽因是杭州细心培育出来的一抹睡莲,怎耐得起风沙的摧残,她染下了难治之症肺病。最后无奈又回到北京,于北京香山进行疗养。

青山依依,蝉鸣雀舞。在香山,林徽因骨子

里的诗意绽放出来,如愿做了她的香山诗人。清雅的墨香被春水浸泡,轻风吹拂,每一字都淡雅如梦,每一行都柔美似画,思绪化身为燕,去寻找水乡旧巢。那一刻的林徽因做了身体里隐藏的另一个自己。

其实细想想,尘世中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中国文化精深,一两个词就可以概括人的特质,却不能描述其复杂心态;可以用一本书写下他的传记,却不能纵观他的本质。我们只能在她留下的痕迹里寻寻觅觅,为一个偶然的发掘欣喜万分。细小,可怜,亦已满足。毕竟人尚不能全部了解自己,何况我们一外人。我只能说,我眼中的林徽因美得洁净,也美得坚挺。

尽管后来林徽因的病情稍愈,身体却总不大好。但这个柔弱的江南女子披挂着诗的羽翼,捧抚着对建筑的狂热,坚持与丈夫梁思成出入荒僻之地。风吹不走她的坚定,雨淋不落她的赤诚。日复一日地进行古建筑考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得不说,她曾经有着睡莲般的高贵与纤弱,但骨子里傲立如梅。

后来,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金作霖是否也是被林徽因这些优异的品质所吸引,以致终

身不忘的呢？都已是作古之人了，这一切已无从细究。或许他所看到的林徽因比我们后来者所看到的更有不同之处也是难说的。



（林徽因和金岳霖）

纵观林徽因的一生，有太多谜团；太多的楼台烟雨中；太多的欲辩无词；太多的欲说还休。余秋雨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的生命由时间和空间组成。时间再怎么长，也就百十来岁吧，延长余地不大。但空间就不一样了，伸缩的范围可以非常悬殊。因此，生命质量的落差很大程度上与空间相关。”

我们不能根据林徽因寿命的长短、走过的路程来衡量这个女子；也不能根据她在一生中认识了多少人，围绕在她身边的又有多少优秀男士来判定她。她的故事已经封土，她的剧情

却没有落幕。

她就像一盏茶，淡淡的清香缠绕，久之不去。你会挖空心思寻找一个辞藻来形容这个女人，却发现茶的香不在口中，而是在灵魂深处，那种美叫人不能忘却。这种空间叫人难以想象，我们已无法再回到过去，去寻访这样一个奇特的女子。只能穿过历史的烟尘，在她或热烈、凄婉、孤寂的生命断章里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在这车水马龙的现代社会里，已经无法再感触到她生命的余温。那么历史的回眸中，可还有她不经意的一个回眸？

JZHPRESS,悦读九州

选摘自《情若莲花的女子：林徽因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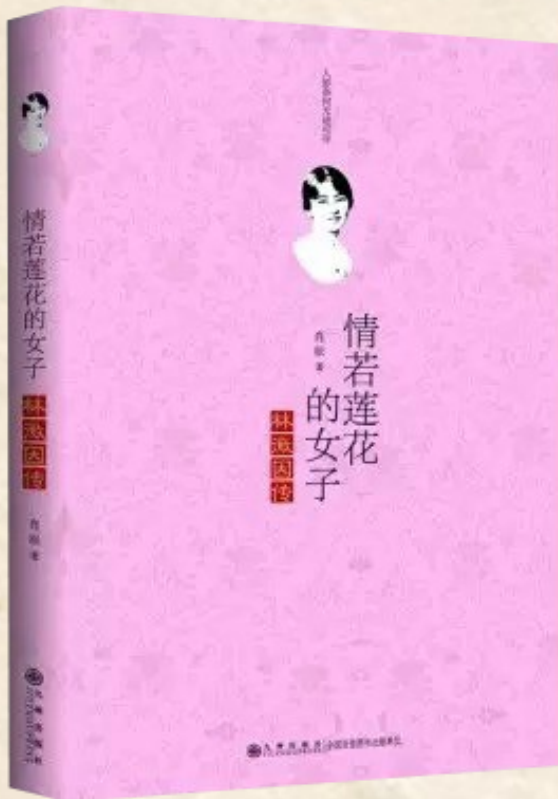
肖辰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个暖暖的午后,一杯清茶,在拂面的春风中,在醉人的墨香里,邂逅一个真实的林徽因。



内容简介：

用最诗意的文字、唯美的笔法、全面详实的资料,生动地展现了林徽因的传奇一生。她是传奇,在时代中逆流而上;她不传奇,华丽背后也苍凉。让徐志摩怀想了一生,让梁思成宠爱了一生,让金岳霖默默地记挂了一生,让世间的男子仰慕了一生,更让所有的女人无端敌视了一生。

作者简介：

肖辰,生于东北,现居北京。善于观望人生世态,她撰写的著作淡雅清新,文笔细腻。找一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文字校审:@沧桑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九州出版社官网



微盘



云盘

Copyright ©2015 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小
滿

